

惟一道路

Ernest Gellner在其名著《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开篇写道：民族主义有着内在的矛盾。现代民族主义默认一个族群一种语言一块土地，是19世纪在欧洲20世纪在亚非拉各民族批量立国的逻辑：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满清帝国瓦解，在其废墟上站起来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问题在于，民族数量何其多，而国家并不无限可分。一国得以立国，必然是因为其民族诉求得志，但立国之后，却不可能尽情容纳其国内各族接下来的独立诉求。此亦一民族主义，彼亦一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零和倾向，正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内在悲剧，如北爱尔兰之于英国，巴斯克之于西班牙，车臣之于俄罗斯，不可尽数。

多民族既必须共处一国，如何和谐相处？这问题没有答案（solution），只有方略（strategy）。

一、对恐怖行动和恐怖分子，以暴制暴，武力解决，肉体消灭，除恶务尽。

二、对分离主义政治运动，既要与之坚决斗争，也要注意与这类政治运动做斗争主要靠政治手段，与打击恐怖分子有不同之处。

三、族群间和谐共处，还有经济、社会、文化、法治等更多维度：文化上彼此和而不同，社会政策上有适当扶持，经济上重在可信可见的机会均等，法律面前有真平等。倘如此，则族群共处前景将取决于一国的社会体系、生活方式、经济水平对各族群的向心力，最终取决于这个国家能否变成更好的自己。走出民族主义的零和游戏，这是惟一的道路。

真正彻底的实用主义

中国精英对新加坡有特殊情结，近30年来有两次关注新加坡的潮流。一次在改革开放之初，一次在近年。新加坡既有法治国家与民主政体，也有一党执政与铁腕治国。外人对新加坡的毁与誉都在这里。誉之者重视如何实现两者兼容的手段；毁之者认为两者没有长期并存的可能。毁誉之间，新加坡却在变。

立国以来，新加坡惟一没变的是彻底的实用主义。这种彻底的实用主义，在过去将哲学王之治嫁接在法治之上，将两代传承嫁接在民主政体的选举程序之中；也正是这种实用主义，使其选择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无保留地拥抱全球化，有效节制既得利益，约束国有资本；还是这种实用主义，使新加坡坚持精英治国，延揽全球治理人才入阁。新加坡对绩效合法性的追求，没有一刻放松。1997年，新加坡与香港的GDP相当，今天已高出三分之一。

只是，绩效定义现在变了。正如本期封面报道所说，付出高强度、长时间的劳动后换来的财富，已经不是“新加坡梦”的全部。新形势下的社会经济形势，使过往的社会管控模式失效。

新加坡在变。真正的政治竞争已经发生，选战激烈而结果不再已知。真正彻底的实用主义，使执政者在顺应这一趋势的前提下管理其进程，而不是与之相抗。总理李显龙对财新记者重申李家不会再出总理，也是在为未来奠基。“时代变了。”蒋经国在台湾解除戒严前夕的喟叹，仍然在回响。真正的实用主义者，都听得懂。

钱去哪儿了

这种背离持续好几年了，现在愈加严重：从数字上看，央行释放出的流动性不少；从市场上看，钱越来越紧张。

钱去哪儿了？

有人说美国退出QE，因此资金先知先觉流出了；有人说利率市场化进程驱动利率水平提高，存款追逐收益率跑了；有人说是资金空转，发出来的钱就在金融市场和房市两头打转，没有进入实体经济。

这些也许都有，但钱紧，主要不是因为流出去了，数字不支持这种看法；更不是因为资金没有进入实体经济；相反，钱紧最看得清楚的原因，正是大量的钱进入了实体经济，然后就死在那里了：一位做投资的朋友说，大量的投机和庞氏借贷人吞噬了信用，只吃不拉，如同神兽。

这太抽象，一个做生意的朋友就讲得具体：他的行业里有一些超级玩家，杠杆极大，持续亏损，但始终能得到银行支持。他曾经以为自己坚持住，等这些玩家倒下，行业可以回归正常。几年下来，这些玩家屹立不倒，同样玩法的新玩家还层出不穷。“等他们退出等不起，我退出吧。”

没有人天真到相信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看上去那么健康，但“钱荒”复“钱荒”，提示人们，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也许比最坏的想象还要糟。那些报表上还不存在的不良资产，已经在吞噬银行的信贷能力——这就是“钱荒”的真相。

系好安全带

一位国际问题专家曾经跟我说，不能过分低估因钓鱼岛问题引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我率尔而对。什么是军事冲突？双方渔政船在海上用水炮对轰算不算？渔政船相互撞击致人伤亡算不算？有人拿手枪开了一枪算不算？冲突这种状态不仅是有与没有，而是一个连续统。

如果把军事冲突定义为双方军舰飞机海空对射，那么出现的可能性是多大？我自己认为不超过5%。原因很简单，各方也许都能从鹰派形象中获益，但没有一方真正需要也承受不起军事冲突。只要没有人真想打仗，双方总能在那个连续统的某个状态及时刹车。

这位专家忧伤地看着我：“你太乐观了。我也认为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这个可能性不是5%，而是25%。”

对话发生在一年前，一年间的事态进展，各种布局走位，让我觉得他的估计比我的离现实更近。

自世纪之交以来，崛起中的中国与现有国际秩序，就是最重要的一组国际关系议题：中国会是一个维护现状（status quo）的大国？还是一个改变现状（revisionist）的大国？如今答案已明，讨论声已息。中国已结束韬晦，决意要求获得自认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位置。这是一条能见度不高的航道，惟一能确定的是风高浪急。

系好安全带吧。

国富论

亚当·斯密说，“将一个国家从最蛮荒带到最富足，只需要和平、简易的税收和过得去的司法，其他的一切都会自然发生。”

当代发展经济学大家Tim Besley称之为繁荣的三根支柱：和平是政府提供的最基本公共品，税收代表了政府从社会抽取资源的财政能力，司法代表了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平保护契约的法治能力。不能征税则无政府，不能提供法治则不配治国。

简易的税收并不意味着低税收。政府的财政能力与法治能力之间明显相关。高收入国家，其政府的财政能力与法治能力一般都较高；中等收入国家的政府的两个能力都在中游；低收入国家的政府往往哪个能力都弱。这也符合人们的观察：发达国家总体而言收入高，税收高，法治水平高。更细致的观察还可发现：低收入国家的政府更倾向于征收间接税，而高收入国家的政府的主要税收来自所得税等直接税。

中国正致力于避开中等收入陷阱，在未来10年如愿进入高收入国家群体；中国的财税体制正在经历20年来的最大改革，未来开征房产税后，直接税在税收结构中 will 越趋重要。这些都在倒逼法治进程加速。这同样符合直觉：不保护财产权，就不能从有产者那里征税。只征税不保护财产权，财产会自己长腿走掉。繁荣的三根支柱缺一不可，也植根于同一土壤：正如Besley所说，它们都生长自有广泛共识和社会凝聚力的制度。

回忆

1998年，我们这个团队开始做财经新闻，报道广信破产、海发行倒闭。天大的事，但国内几乎没有其他媒体关注，“金融无小事，报道要谨慎”的警告太多，自我克制惯性还在。

2000年，我们发表《基金黑幕》，指称当时国内仅有的全部十家基金公司均涉嫌违规操作。十家基金公司联合声明将起诉。时任证监会主席则表示，基金公司们应欢迎媒体和公众监督，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诉讼偃旗息鼓。

2001年，我们发表《银广夏陷阱》，指称当时流通市值第二大上市公司银广夏持续数年利润造假。证监会立即启动调查证实了指控。银广夏崩盘。

从此，金融报道几无禁区，可这不是故事的全部。

某年，我们发表《世纪星源症候》，招致这家上市公司在深圳起诉。在法庭上，我第一次看到原告和被告各自陈述而法官凭心独断的情形。我们败诉。

某年，一位同事发现邮箱被入侵。技术部同事一查入侵者的IP地址，发现攻击正来自她刚去做过调查报道的地方。

某年，有关部门找上门来，要我们披露某篇报道的信息来源，如果不披露则属捏造信息。最终能逃出去要么出卖信源要么承认捏造新闻这种“第二十二条军规”式处境，我们要谢天谢地谢人。

.....

新闻生涯18年，有时会觉得现在是从业以来最难的时候；有时又觉得是最好的时候，因为还能有所作为的领域仍在扩展。忧欣交织，好的新闻工作者都是双相人格。

下一个成功最难

诺基亚将手机业务卖与微软，有人为昔日手机霸主叹息，没有人羡慕买家微软。如果说哪家大企业失去了十年，微软最有资格。微软的悲哀并不是wintel联盟不再统治IT世界，而是今天互联网的基本图景，盖茨早就看到；今天大多数最热门的互联网服务，微软早就有过雏形。却又如何？比如，微软的MSN Messenger占得即时通讯的先机，全面覆盖桌面电脑世界。但今天以QQ起家的腾讯有800亿美元市值，而MSN Messenger彻底衰败。微软孕育过太多的潜在巨人，却几乎没有谁能长大。

成功极难，从成功走向成功更难，因为成功经常是下一个成功的负累而非凭借。苏宁刚成为中国家电连锁王者，就陷入电商带来的另一种割喉战。苏宁抱怨市场没有给其与电商的同等待遇——为什么不要求销售额逼近1000亿元的电商盈利？但市场要给你电商待遇，得你真成为电商，而不是披着不合体电商外衣的家电连锁。上市地位、实体网络不再默认为优点，苏宁这一场战争比上一场战争更难打。

药方易开。微软早就应主动分拆，把新业务与现金牛业务切开，充分赋权，独立运营。不能做这件事，则收购诺基亚只会增加其控制病，不管鲍尔默在不在。苏宁亦然，上一次成功带来的财务资源要用足，其他则要尽可能切割，新归新，旧归旧——合力往往是幻觉，内耗是现实。

知易行难，所以腾讯居然能够在QQ之后长出微信，值得再三致敬。巴菲特说他惟一最擅长的就是资本配置，能从现金牛拿出钱来，投到下一个交易/公司中去。巴菲特慈眉善目，却远比时常大力捶桌的鲍尔默心狠手辣。世上有几个巴菲特？

不给权力拎包的人得还有机会

在商言商，是商人的自我修养。不过，正如有人群的地方就分左中右，商人也有多样性：呼吁并致力于节制权力的，是公民商人；手握王爵口衔天宪凭借权力高蹈市场的，是官商；与权力蝇营狗苟上下其手的，是红顶商人；被权力鱼肉终日不得闲的，是私商。什么商人言什么商。

商人逐利并因此追逐与权力结合，古往今来前后左右哪里都有，但社会不能只剩下这条路线图。市场经济绝不能由权力资本把持代言，否则社会将陷入来回翻烧饼的循环：反对权力资本就要回归国家主义；反对国家主义就要容忍权力资本。中国必须跳出两个坏选择之外追求好选择。

Luigi Zingales出生意大利，弱冠负笈美国，现为芝加哥大学Booth商学院教授，新著《为人民的资本主义》（A Capitalism for the People）。他认为要拯救美国经济免于权贵资本主义的威胁，就必须坚持维护市场竞争，而非维护企业利益：节制特权，机会平等，市场经济。美国经济多大程度上受权贵资本主义威胁见仁见智，但Zingales的见解显然也适用于中国。

书中开头，Zingales说他为什么要离开意大利，因为那里没有什么取决于个人能力高低，一切都取决于有无关系。“年轻人想要有个前途，都得为某个大人物拎包（carry the bag）。”中国人看到拎包这个词都心照，世象相近，语言就相通。

那些不给权力拎包的人，在中国得还有机会。

如何正常商业谈判

“对，就是要确保这是一个正常的商业谈判。”

3月底第二届“岭南论坛”期间，我们将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请到“财新下午茶”节目聊天。问及三家移动运营商是否向微信收费时，苗圩说，“作为政府主管部门，绝不允许几家联合起来欺负腾讯。”

作为政府主管部门负责人，这是正确的表态。苗圩还说，如果中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家串谋，就违反了反垄断法，“绝不能靠占有垄断地位，卡死像腾讯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企业。”对三家运营商收费意愿，工信部正在协调，已经要求运营商提交方案。“监管部门总体上会站在用户的角度考虑。微信有收费的可能，但不会大幅收费。”

至于向微信收费的标准，苗圩说，“除了我们协调，还得靠竞争机制，三家运营商不能一起串通一气，来垄断这个市场。让他们跟各家去谈判。”

苗圩所说都对，只是还差一点。除了这三家，腾讯没别的可谈。是否向微信收费，首要的不在腾讯与这三家如何谈判，而在创造腾讯能与运营商平等谈判的环境。工信部最重要工作不在协调收费标准，而在放宽准入，增加竞争。

如果放开电信准入，谁想开电信公司就能开，那么电信运营商向不向腾讯收费，就根本不是问题，用不着人民操心，也用不着政府操心。现在准入限制如此之严，另外收费怎么看都像劫道；如何谈，才算一个正常的商业谈判？

何谓新闻客观

新闻工作者不是从一张白纸起步，对正从事的报道必有先见，正如人们总是在不确定的情形下，根据不完整信息作预测相应决策。先入之见，经新的经验/观察/数据调整为后验命题，又成为下一轮的先入之见，不断循环。这是贝叶斯定理表达的认知演进，也是科学研究中的假设-检验过程。不同的新闻工作者就同一主题的新闻调查，不论先入之见多么不同，只要按贝叶斯方法持续调整，认知最终会趋同，路径长短而已，先入之见合理则路短一些。

新闻客观，不是要求新闻工作者无先见，而是要求新闻调查的假设与检验过程经得起敲打。形成合理的先入之见，经历合格的检验过程，难。不仅是态度，利益冲突，缺乏经验，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心理和认知误区。认知心理学、行为经济学几十年来有大量研究：人们往往过度受第一印象的影响，经常从亲历事件中推出过多结论，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表达会作出不同反应，筛选出与既有看法兼容的信息，忽略相反的信息，总是过于自信……单子还很长。

克服这些认知误区，是新闻工作的定义的一部分。哈佛大学教授Howard Raiffa给出了三步疗法：要多了解心理和认知误区；作判断时要意识到自己可能陷入这些心理和认知误区；总是要反思自己的第一反应。

这几句话新闻工作者应时刻自省。它提示了一个漫长而艰苦的修业过程：新闻客观，首先是一种态度，然后是一个过程，最后才是一个结果

编辑是干什么的

“做了多年编辑，觉得编辑之要是给记者帮忙不添乱：为记者提供机制性的支持，为其分担压力，提供缓冲层；至于新闻业务上的协调指导，还在其次。这不仅适用于编辑，适用于新闻工作的全链条。”

我的这段话，未成想抛砖引玉，引来了同事张进的精彩回应。

他说，“我认为编辑最重要的，是让记者心里踏实，让记者只要努力工作，就不用担心风险和不公平；其次，是给记者方向感，让记者知道全局，知道向哪个方向努力；再次，才是具体的采访指导；再再次，是具体的稿件修改等等。”

他把这扩展成了一篇深受欢迎的文章《编辑是干什么的》(zhangjin.blog.caixin.com)。我在此撮要言之，编辑是为记者提供公共品的，要提供安全、公平、方向、判断、服务。

这就是财新编辑们的自我认知，有些同事做得更好些，但大家都致力于此。

我们希望，在财新，专业新闻工作者合作，搭建出发掘真相的一种高效率的生产方式。除此，我们追求多介质的表达，包括文字、图片、音频、视频、英文；实现多平台传播互动，包括纸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iOS、Android客户端。我们做这些，既是因应媒体业态的变迁，也是因为真相是多种形态的：在中国，没有什么东西是铁板一块。知行合一，善用工具，要准备跑百米，也要准备跑马拉松。全能全天候，才能在时下的中国做好新闻。

寻找必要条件

与我们历次年度特刊一样，这本朝向2013年的特刊延请一流作者，不论他们身处中国还是海外，具洞见，作预测，拿策略；与以前又有所不同，这本特刊视线放得更远。不约而同，作者们不只谈2013年会发生什么事及如何应对，读者会读到很多“2020年”，还有很多“未来10年”。

视界打开了。中国的事千头万绪，却不难找到头绪：政治没办法，什么都没办法；政治有办法，什么都有办法。大一统（unitary）体制下，活力是自下而来，目标则要自上而定。

关于目标，已有共识：迈向高收入社会、法治社会、民主社会、绿色社会。如何从现实往前走到这一目标，则各指其路，每条路都有岔道，每个岔道都有多个选择，再往前走，又见岔道。岔道复岔道，一座迷宫。

歧路亡羊，迷失在中国的复杂性之中，不识迷宫面目，只缘身在其中。其实出迷宫有其捷径，从出口往回溯，答案迎刃而解。

为本次年度特刊撰稿的作者们，就有这种哥伦布竖蛋的能力。比如说，怎么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Scott Rozelle就说，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要成为高收入社会；要成为高收入社会，则廉价劳动力必须要升级为高工资劳动力；要支撑得起工人的高工资，工人就必须有高劳动生产率；而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投资于人力资本——大规模的教育投资。Scott被称为最懂中国农村的外国人，确实有其原因：明快，有力，有效。

如果说过往不明晰目标何在，那么从现状往前走，在迷宫里一步步探索，摸石头过河，是合理的。但现在目标已明，路径可倒推而得，何必继续摸石头？

当然，从目标倒推而得的，往往只是必要条件，还不是充分条件。Scott所说大规模的教育投资，也只是中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必要条件：没有大规模的教育投资是不行的，但只有大规模的教育投资，并不就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我敢说，本年度特刊，70余位作者，正是先看到了迷宫的出口，而分别从迷宫的各处，各自指出了走出这个迷宫的必要条件。把这些必要条件拼起来，读者就得到了中国未来10年的行动指南。

早日走出迷宫。以此共勉。

希望

新年来到，我们谈希望。

未来十年已经起步。从2012年秋冬之际的十八大到2013年春天的全国“两会”，既是新领导集体的接班过渡期，也是与人民的蜜月期。人民期待变革，他们释放变革信号。良性互动开了好头：兴奋，希望，期待，积聚体制内外共识，储备改革势能。

改革千头万绪，人民诉求多端。历史返照现实，实际的改革路线图，无论是当年“摸着石头过河”，还是今日“最小一揽子改革”呼声，都遵循沿着最小阻力线前进的不易之理。寻找最小阻力线，为“最小一揽子改革”组合提供素材，我有两点希望。

第一，实现更开放的互联网。中国的互联网不需要选择性地向世界开放，反之亦然。改革与开放孪生，总是共进退。走过30年改革开放道路，中国今天应更自信更从容面对全球化的全面洗礼。

第二，改革强制计划生育政策。国家可引导人民更有远见地规划生育，但生育决定权应回归家庭。即使只计效用，强制计生政策也早已渡过其有用阶段，现今反而与人口老龄化叠加，造成潜在的巨大大人口负债。取消强制计生政策，所有人受益，只有个别部门利益受损。有道有术的政治家会作何选择，不问可知。

更开放的互联网说明中国真开放，取消强制计生政策说明新一代领导层有政治智慧。改革先易后难，我推荐从此两翼试刀。

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棋虽小道，却时常被赋予特殊的意义。

1985年，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战。中方江铸久狂飙五连胜，遇日方小林光一强烈反扑六连胜，逼到中军帐下。主帅聂卫平连胜小林光一、加藤正夫、藤泽秀行，赢得擂台，实现个人最大突破，终结中国棋手遇日本超一流棋手无胜绩历史，也捅破了中国围棋与日本围棋如纸般薄的差距。多少年来第一次，中国如此光荣地战胜日本，哪怕只是在围棋擂台之上。

尧造围棋，以教丹朱。围棋发端于中国，而光大于日本。近代之前，中日围棋交流少之又少。棋史传说，唐宣宗棋待诏顾师言33手镇神头，击败日本王子，但未留下棋谱，后人附会以王积薪一子解双征之谱。道光年间，日本棋界大豪幼庵因硕意欲入华，困于海上。直至清末民初，中日才真正相遇于，中国棋手不堪一击，如两国在战场上的交锋。日本二三流棋手可让中国最强棋手三子而无一败。直到1961年，日本女棋手伊藤友惠访华仍八战全胜，为中国棋界之耻。

棋手积弱，国家积困。盘上争胜与强国梦相砥砺，正是陈毅元帅“国运兴，棋运兴”一语的由来。围棋报国，如实业报国、教育报国、科技报国，是那个时代的强音。

上承刘棣怀过惕生，下启聂卫平马晓春，从60年代中到80年代初，中国围棋从谷底爬起，陈祖德代表了第一代被委以赶超日本任务的中国棋手。中国围棋界有限资源的全部，很长时期集于包括他在内的几位棋手之身。今天的体育举国体制，那时已施之于围棋界。

陈祖德未达巅峰，也未辱使命。国内，他1962、1964、1974年三获全国围棋冠军。对日，陈率先成为首位分先战胜日本九段的中国棋手，1965年10月25日执黑击败岩田达明九段。在其盛时，陈祖德与日本一流强手互有胜负。中间经历“文革”，围棋种子不绝如缕，托赖陈祖德及其同代棋手的坚持，保持中国围棋的薪火，终有聂马后来的爆发。

中日棋界的相争互哺，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民国年间，日本棋界帮助棋童吴清源东渡日本，入濂越宪作门下，鏖战40年，将同代高手一一降级，终成昭和棋圣。80年代，日本棋界泰斗藤泽秀行每年自费带领棋手访华，中国棋界普受其惠。今天日本围棋已然衰微，每年仍然有棋手团访华，中国棋手则成为反哺回报的一方。

中日围棋擂台赛时，陈祖德已退出一线。1980年，陈祖德赛间吐血，检查出胃癌，病中撰写自传《超越自我》，激励人心，影响远超棋界。1992年中国棋院成立，陈担任院长，2003年卸任。2012年11月1日，因患胰腺癌，陈祖德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终年68岁。

陈祖德的名字，常常与著名的“中国流”布局连在一起。星、小目、拆三步布局法，兴起于上世纪60年代，长盛不衰，至今与其变体仍是最流行开局法。它始见于日本棋手对局，经棋家安永一之手流传至中国，在集体训练中发现其威力，迅速推广。在一次中日围棋交流赛中，以陈祖德为首，访日的中国棋手无论执黑执白，一律以此法开局，日方呼之“中国流”，由此得名。滥觞于日本，光大于中国，“中国流”的流传，与千年前围棋的流传，方向相反，内涵相同。

陈祖德生于1944年2月，七岁习弈，棋风嗜斗力，近乎日本围棋走厚然后战斗一脉，更从中国古谱汲取营养。他在80年代初详解清代大家范西屏、施襄夏当湖十局，后系统整理中国古谱，笃信古人斗力不让今人。晚年解说清初棋豪黄龙士与周东侯对局谱，煌煌15册，未及完成而逝。

陈祖德辞世之时，围棋世界已天翻地覆。昔日霸主日本早已衰落。中日围棋擂台赛战日本一败再败，最后避战，终于在世界棋坛上一胜难求。中国追赶日本二十余年，即将超越之际，韩国围棋却意外崛起，抢过身位，成为日本围棋的掘墓人，随后压制中国围棋十余年。直到今天，中国才在与韩国的对抗中略占上风。

中国棋人的围棋报国梦，已然消融。假想敌不再。时代变了。举国体制还有残存，国家队仍有建制，但今天中国终于能略占韩国上风，与此无关，而是因为一群90年代出生的少年。他们散布于各大民间围棋道场，追求个人修业进步。国家队不再是惟一进身之阶，也绝无围棋报国的使命意识。日本围棋巨人坂田荣男昔年曾放言30岁前不可能出名人，今天则是20岁还拿不到世界冠军则终生无望。在空前激烈的竞争中，中国围棋回归围棋，胜负更纯粹，胜负师们更自由，因此更强大。“国运兴，棋运兴”，释放出新的内涵。

等发令枪响

许多人担心经济“硬着陆”，有人认为已经发生。我不知道答案，但知道中国经济全天候增长本身是一个神话。中国对经济明显下滑并不陌生。1992年、1998年，猛烈程度不亚于今天。今天只略有不同：经济下滑与增长方式转型同步，增加复杂性；迄今未出现严重失业问题，减少了痛苦。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地方政府绷得太紧，债务太多，要求经济刺激的呼声最高，有一些地方面临难关，但统算全国大账，政府整体财政能力强健，风险可控。从现在起到明年3月，启动危机处理模式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同样地，明年3月全国“两会”，自上而下的领导层换届终于完成后，新一轮大规模投资不可避免。国家发改委早已放松项目审批，各地政府的本地经济刺激计划加在一起好几十万亿元。系统信号已经重调：准备项目，占好跑道，等中央发令枪一响，抢跑。

发令枪不会不响。未来中央决策层构成必然有更多来自地方的因素，决策机制也将更依赖共识。

以土地为核心的模式将继续，这是地方政府一切杠杆的基础。长期中，这不可持续。地价不能涨到天上去。但要取代这个模式，需要重新构造中央与地方的分级财税体系，也必得让地方政府举债受市场有效约束。这些必须要做的事，没有一件容易。

在即将到来的未来，最容易做的事，还是先榨干目前模式的剩余空间。

所以，等发令枪响吧。

三种泡沫

泡沫破灭的时候都是相似的，泡沫形成的时候就各有各的不同。

第一种泡沫，资产本身无孳息，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价格上涨的惟一理由是预期还会继续上涨。上涨与对上涨的预期互相推动，不可永续，参与者无论贤愚心知肚明，只为追逐泡沫膨胀的过程，侥幸于能在破裂之前出逃。郁金香、君子兰、普洱茶、红木家具，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狂欢。

第二种泡沫，股价上涨与企业盈利改善形成闭环。每一步，股价上涨都有企业盈利改善的支撑；每一步，股价上涨反过来帮助改善企业盈利。这就是索罗斯所说的反身性。

反身性在中国市场并不少见：渠道购货囤货，同时购入企业的股票，购货创造企业销售收入，再转化为利润，以数十倍市盈率放大为股价增幅，渠道获得投资收益，以此再购货，循环往复。

只要市值膨胀，企业和渠道皆大欢喜。如果所选标的得力，故事动听，游戏可以持续很久，甚至变成一部分人的信念。

第三种泡沫，经济走出低谷，预期改善，企业增加投资家庭增加消费，杠杆加大，信用扩张，推动经济进一步向上。信用扩张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形成自我强化的循环。如果陶醉过久，信用扩张过度，明斯基时刻终将到来，繁荣结束，减债开始，无人躲得过。

时下中国，你看到了几种泡沫？

埃文斯：“我都不赞同

对话人

麦克·埃文斯 高盛公司副主席

王烁 财新传媒主编

[对话背景]

在所有国际金融机构中，高盛深通中国；麦克·埃文斯（Michael Evans）则是高盛中国通里的中国通。

1997年，中国电信（现改称中国移动）完成里程碑式的海外上市。高盛为主承销商，埃文斯与有力焉。事后时任中国副总理朱镕基接见，问道：听说你们有一个很了不起的银行家，把这个项目操作完成，他是谁？后来的高盛CEO保尔森手指埃文斯。朱镕基又问，“这样的人你们高盛有几个？”保尔森回答：就一个。朱镕基说：“我们需要这种人的帮助。”

中国电信香港上市，是埃文斯参与的第一件大事。自那以后，15年间，中国垄断行业重组上市的数波大潮：电信-能源-金融，他都没有错过。

2001年起，埃文斯任高盛股权资本市场联席主管；2003年起，任证券业务全球联席主管；2004年开始，任高盛亚太区主席；2008年2月至今任高盛副主席；而去年1月开始，同时任成长型市场全球主管。

埃文斯在媒体上的曝光率不高，但对当今各方关注的焦点问题，如中国经济走势和政策取舍、金融市场深化及国企改革的出路，他都有自己的看法。

“中国学什么都很快。”采访结束，他发出感叹，也在提醒记者，新的变化正在发生。

[对话摘登]

“经济结构调整这个问题已经讨论了很长时间了，但现在真的发生了”

王烁：中国将今年GDP增长目标设为7.5%，而当前中国经济似乎正下滑到7%的水平。这是中国经济增速的暂时性放缓还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常态”？

埃文斯：7.5%的目标只是一个目标。如果看中国以往设立的目标，比如在五年计划中的目标，会发现这些目标都要低于实际表现。因此目标和最终结果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现在人们普遍同意，中国经济增速正在放缓，争论在于放缓的程度。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将在二季度稍微放缓，但全年仍将在8%以上。我们并没有其他人那么担心“硬着陆”或中国经济增速显著性下降。

王烁：对于现在的中国经济，至少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中国经济正走向硬着陆，需要大规模的经济刺激；另一种认为，这其实是中国经济正常的结构调整过程，虽然有些痛苦，但是不应恐慌，也不该以进一步扭曲经济为代价，实施新一轮刺激计划。你支持哪一种观点？

埃文斯：我都不赞同。现在对中国经济有来自国内外很多不同的看法。一些国际分析家持相对悲观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会硬着陆，也有一些相对乐观，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虽将放缓，增速仍旧居高。我认为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经济结构调整，这个问题已经讨论了很长时间了，但现在真的发生了。

虽然出口增长正在放缓，但国内消费增长正明显提速。再平衡过程会是个较长的时间，部分原因是中国经济规模庞大，另一个原因在于调整投资、出口、消费之间的比例是个艰难的过程。消费需要人们手里有足够的钱去购买商品，这正是这些年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根本。看看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发布的《2030年的中国》报告。报告对2030年前的中国出口、投资和消费三者比例作了预测，而到2020年预计消费占GDP的比重是60%。有人会质疑变化的程度，但消费的增长不是绝对值，而是与投资 and 出口变化相对的数值，消费的比例逐渐增大。

以今天的世界为基础，假定将来中国增长全靠出口，那么中国经济前景会大不一样。再来比较这份《2030年的中国》所作出的投资、出口和消费比例的预测。假设不同结果会大相径庭，看到这些，你就会理解，为什么对每一种极端情景都会有人坚信不疑。你可以支持任何一个看法。但如果认真思考未来五到八年将要发生的事情，我认为会发生很多改变，但很多人没有看到这一点。

王烁：一些观察家认为，高盛最近出售所持中国工商银行的股权，对市场发出了一个负面信号。你有什么评论？

埃文斯：过去几年，我们每年都出售一次中国工商银行的股权，这与我们管理资产负债表中投资规模是一致的，但并没有表现出对中国信心的减退，也不是对工行董事长姜建清、工行或者中国银行业信心的减退。最近一笔出售交易的购买方是单一战略买家，他们也是中国银行业的重要投资者，与我们一样对中国充满信心。考虑出售时，我们不希望干扰银行和市场，不想发出负面信号，结果正是如此。我们继续对中国工商银行充满信心，继续保持战略持股，对中国的经济和中国银行业非常乐观。

“中国国内有足够的资金满足中小企业的需求，问题是配置的工具是什么”

王烁：十几年来，你参与了中国一系列最大的国有企业的重组改革。今天中国面临新一轮国企改革的呼声。如果有机会，现在你会向中国的决策者提出什么建议？

埃文斯：中国的国企改革已经完成了许多很好的工作，当然还有其他事情要做，但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发展。中国有大约4000万个中小企业，对其发展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找到有效的融资途径，使他们发展壮大，雇佣更多的员工，创造财富。这也与未来的消费潜力直接相关，是进一步改革的焦点所在。

王烁：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到任以来推出了许多新政策。这些政策的目标，一言以蔽之，是将中国的资本市场打造成一个正常市场，一个能够正常进入和退出的市场，一个自由定价的市场，一个有监管的市场。你们是老朋友了，你会有什么建议？

埃文斯：郭树清现在所做的是巩固股权和信贷市场的基础，以支持可持续增长和发展。这在尚福林任证监会主席时，已实施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但这些改革和市场的建立需要几年的时间。郭树清现在进入了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和发展的下一个重要阶段。

现今最重要的一步是发展债券市场。一个真正的债券市场，不仅是政府和国企的银行间市场，还应当包括企业债券，应该是一个规模大、流动性强的市场，债券可以自由交易，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都可以进入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市场融资。这个过程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资产管理机构以及专业人士的进入和发展。

王烁：国有银行的支配地位阻碍了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挤占了其他融资渠道的发展。是否有必要进行新一轮国有银行改革？

埃文斯：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对它的讨论通常过于简单。中国最大的四五家银行，算算它们相对于其他数百家银行的信贷业务份额；然后看看美国、欧洲或其他亚洲市场，会发现中国这四五家最大的银行与美国、欧洲的前几大银行在它们各自市场中所占的比例差不多。中国最大的银行并不是过大。

更大的挑战在于，作为整体，这些银行提供信贷的活动占整个金融市场的比重太大。所有的风险都集中在银行部门，而不是在资本市场和其他投资与借贷实体中分散风险。

中国大量企业需要融资。中国国内有足够的资金满足中小企业的需要，问题是配置的工具是什么。银行不可能是惟一的配置工具，虽然银行借贷是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途径，但规模大、流动性强的资本市场，包括股权市场和信贷市场的建立更为重要。

以人民币计价的私募股权公司已有显著的发展，还有信托公司，都可以提供资金。中国还需要再发展一些银行、资本市场、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信托公司。

这正是市场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走过了很长的路，现在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福山错在哪里

2004年，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著书《国家建构》，其中用两个指标分析政府。第一个指标是广度（scope），就是政府干什么。大政府还是小政府？这是一切政治分歧的由来，福山剥掉价值判断，从功能上把政府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提供基本功能，包括纯粹的公共品（国防、法律和公平、财产保护、宏观经济稳定、公共医疗）和基本的平等（保护穷人）；第二类还包括解决外部性问题（环境、教育），管制垄断，社保，金融监管；第三类更积极主义，包括但不限于产业政策和财富分配。从第一类到第三类，政府干预的广度越来越大。第二个指标是强度（strength），这些事，政府做得到位不到位？比如说，你说要建立平衡可持续的社会安全网，做到了没？

在理想的情形下，广度代表人民的授权，强度代表政府的表现。各国政府可分为四类：管得既广又强的；广但弱的；窄但强的；窄且弱的。前苏联政府管得极广，但强度低于西方。法国在西方干预最广，强度也最高，这跟17世纪以来中央集权历史有关。美国管得很少，胜在够强：小政府加法治社会。

加入时间变量，更可看到：苏联从1980年什么都管得多，变成2000年俄罗斯管得很少但管得都很弱，对应剧变后的动乱年代；1981年到1995年，新西兰发生了管制革命，政府管少了很多，而强度明显提升，对应解除管制革命。

中国在哪里？往哪里变？在福山看来，中国的变化是水平的：从1978年到2000年，政府广度变小，强度依旧。这似乎合乎直觉，但存在根本错误：如果福山是对的，那么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例将减少而不是增加。现实不是这样。错在哪里？

我附议

减税不会错。

首先，年年税收增长保持3倍于实际GDP增长、2倍于名义GDP增长的速度，不可持续。个人和企业整体不能获取与经济增长相一致的收益。蛋糕在变大，但经济参与者所获份额变小。不合理。

其次，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微调，打开减税空间。此次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人大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GDP增长目标调至7.5%，虽较过往8%目标下调幅度有限，但显示了决策者相较于增长绝对值更看重增长质量，也比以前更关注增长的代价。过往税收增长强劲，部分原因是政府大量投资所需，服务于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模式的黄金期过去了。

更重要地，藏富于民更有效率。对于个人，减税增加可支配收入，有利于增加消费。对于企业，减税增加其财务资源，自主投资。减税的本质，是政府将一部分经济决策权，交还给数以亿计的个人和企业，由其自主决策：少一点政府，多一点市场。这一转移改进效率，更不用说免于政府主导型投资引发的浪费、贪腐及其他耗散。

全国政协委员李剑阁此次“两会”提交提案，建议规定扣除CPI后税收的增收幅度。超出不能作为政绩，而应该作为人大质询和问责的事项。他认为，如果2012年就把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控制在10%以内，至少可以给全国企业和居民减少1万亿元的负担。这与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立即减税1万亿”的主张不谋而合。

我附议。

吵架的形而上学

在从事新闻工作之前，我曾走在前往哲学家的道路上。请容忍我在编稿之余的一点哲思。

形而上学，meta-physics。Meta-是伟大的前缀，把一门学问提升到一门关于学问的学问。我为此发明Meta-argument，元辩论，或者关于辩论的形而上学，或者更实事求是，关于吵架的形而上学，简称吵架学。

第一，认识自己。德尔斐神庙刻着呢，你是吵架这块料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吵架亦然。一层层须经历过。不誓愿入地狱，别想普渡众生。

第二，认识对手。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极高明而道中庸，夫子对吵架学何其精通。普通人仰望圣之余，最好记住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提示：一种新的科学理论之所以取代旧的科学理论，并不是因为信奉旧理论的科学家们接受了新理论，而是他们都死光了。

第三，认识观众。如果说吵架是为了启蒙群众，你很快会发现这是自欺欺人。群众比你还有主见。刚开始你还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不久就恨不得托马斯·库恩说的那种情形早点到来。影响没有看法的人形成看法，才叫启蒙（enlightenment）；说服不同看法的人认同你的看法，那叫改宗（convert）。催化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非大德不能为。你是这块料吗？

第四，认识目标。吵架是为了真理？为了虚荣？为了实利？不论是为了什么开始吵架，没有一场停不下来的吵架不发生为了吵架而吵架的异化。所有人都知道，如果想做出最后一句漂亮话的人，吵架永不会停止，因为人同此心，又不能钳住对方的嘴。真理不是辩出来的，倒是会淹没在口水之中。

说不清的，一定要保持沉默——维特根斯坦。

敬畏心

同事王和岩前几天发微信，说到见了一位采访对象，惭愧地得知去年和同事合作的一篇稿子有个细节出了错。这种经历可能每个记者都有过。寻找真相这件事特别难。记者每天不管怎么小心，都有失手的时候。

最常见的是因为过于相信某个核心的采访对象，而忘了他很可能也是局中人。我们去年在动车事故调查过程中，曾经有一个采访对象主动找到我们，提供了很多重要信息。因为他提供的信息都比较机密，也逐渐得到了证实，我们相信他就是调查组成员。几个月之后，我们才确认此人为杭州电务段的人。这个误判，虽然没有造成报道的失实，但在很长时间内对于我们对于真相的认知和评判还是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影响。

同事张进形容寻找真相的过程是拼图，王烁则称之为盲人摸象，摸和拼的过程很容易发生各种偏差，并且，在很多时候，你很难知道你是否已经完成了整张拼图。更有些时候，你确实已经拼完了这张图，却在过了一段时间后发现这只是一张更大的拼图里的一部分。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那时，也惟有悚然而已。

“电信战非洲”这篇长文，记者赵何娟远赴非洲采访了将近一个多月，写作又写了一个多星期，到了编辑手中，前后三道编辑还是一遍遍地再核实相关的说法和数字，并再找国内银行和外资银行的人士求证。所有努力，都是为了减少遗憾和惊悚。关于寻找真相的调查方法，前人有很多总结，比如，坚持交叉证实，不偏听偏信，坚持对立面采访，坚持与批评对象见面，坚持找到一手权威数据和证明，等等。但真正坚守者并不多，因为遵守它们需要记者付出更多心血和努力，很多时候，只是因为想当然，我们就与真相擦肩而过。

远虑与近忧

2008年夏初，美国金融危机高潮将来未来，债券巨人Pimco公司CEO 穆罕默德·埃尔-埃里安 (Mohamed A. El-Erian) 出书《当市场相撞》，认为那场危机源于国际金融体系范式变迁。有一段话：

“天下只有四种事：重要而紧迫的，重要但不紧迫的，不重要但紧迫的，不重要也不紧迫的。人人都能识别哪些是重要而紧迫的，哪些是不重要也不紧迫的。在此之外，成功者重视那些不紧迫但重要的，而失败者重视那些紧迫但不重要的。”

2011年末危机再度升腾，什么是重要而紧迫的很清楚：要防止2008年秋天的惨剧重演，防止金融体系停摆，经济骤然失速。金融经济当局有此共识，最坏的情形不会发生。

貌似也很紧迫的，是提振经济的反周期动作。2010年的短暂乐观情绪已经消散。每个经济体都在下调经济增长率预测，如果下行过于迅猛，新一轮提振经济之举会鱼贯而出。

中国情况有点特别。一般说来，自从货币发行与黄金等固定锚脱钩以后，在人民能忍受的水平内，各国政府都倾向于用印钞来解决困难。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的特点是因为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和其他原因，对政府多印钞能承受的时间比一般国家长一点，能承受的数量多一点。相应地，如果到了通胀失控的临界点，中国政府反手压通胀的决心也会比一般国家更坚决。长期渐进式放松加骤然紧缩，中国当前处于这个政策组合的后半段，决策者判断通胀是眼下头号大敌。

对当前形势的判断和判断决策者对当前形势的判断，主导了眼下的市场。其实，反周期调控没有看上去那么重要，十几亿中国人如此勤劳，如此急于改善自己的处境，这澎湃动力不会因正常的经济周期起伏而耗散，足以将经济拉出低潮。中国经济唯一承受不起的折腾，就是恶性通胀。其他宏观调控措施，无论刺激还是紧缩，对经济都只有边际影响，无关根本。

看上去不急但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为中国增长的可持续奠定制度基础设施。过去30年增长的最主要动力，一是解放农村劳动力，二是加入WTO使它们在全球化中实现价值。打破桎梏，融入世界。今天，如果经济从行政干预下解放出来的进程得以继续，并与法治社会共进，它足以打破增长的天花板，战胜所谓中国人口红利消失、中等收入陷阱，还有所谓中国无创新等等。林毅夫教授称中国继续增长30年，如此才不是梦。

这件事，人人心中皆有，但笔下却少。先尽情享受眼前这场盛宴，把不急的留给未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本财新年度特刊，来得不合时宜，恰到好处。推荐各位细读。着眼于未来，着手于2012。

让别人去做奉承这种事

乔布斯在同一个地方成功，失败，然后获得更大的成功。商业传奇很多，很少这么传奇。常见一招鲜，吃遍天；一旦不灵，公司归于平淡乃至衰败。微软桌面系统无敌，但在桌面系统以外的领域笨重不堪；联想卖电脑在国内无敌，但在卖电脑以外的尝试有苦难言；Google搜索广告无敌，但看看它在社交领域都干了些什么.....

同一个地方既指苹果这家乔布斯创始然后被赶走今天又光荣从之退休的公司，也指苹果公司兴于兹败于兹再兴于兹的封闭平台商业模式。乔布斯证明，平台之争即使重要但也没有人们所认为的那么重要。Wintel联盟过去曾经不可一世，苹果今天一家独占价值链登上全球公司市值之巅，都不说明价值链联盟与封闭平台之争有了结局。Android与iOS的决战就在拐角。

事在人为，人可胜天。

乔布斯不奉承用户。不能说苹果注重用户体验，正如不能说苹果不注重用户体验一样。乔布斯重视的是自己重视的用户体验。拿到产品之前，苹果用户往往并不知道需要苹果提供的特殊体验。有些时候，乔布斯提供的这种特殊体验变成笑柄，比如那款叫做cube的迷你电脑；有些时候，这种特殊体验不容分说地改变一切：谁还记得iPhone之前所有触摸屏手机都是用笔戳的？好的企业家，偏执狂一样地提供人人都想要但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体验。一个乔布斯站起来，身后有千万个乔布斯在打拼。

把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做到最好。奉承这种事，让别人去做吧。

有中国特色的魔鬼交易员

哪里都有魔鬼交易员（rogue trader），法国兴业银行有，瑞银有，中国也有。魔鬼交易员都相似：内控漏洞、激励错配；但中国魔鬼交易员又有鲜明特色：他们不在华尔街，不在伦敦金融城，而在中国银行体系最草根的分理处。他们特别坚强。十余年来，他们的魔鬼交易模式就没怎么变过。

十余年前，我的同事就报道过一起基层银行人员内外串通，“劫持”银行信用吸储，将巨量储户资金体外使用的案件。那件事发生在湖北十堰。十余年后，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内蒙古包头：同样是银行人员内外串通，同样是“劫持”银行信用吸储，同样是巨量储户资金体外运用。十余年间，中国的银行经历了剥离不良贷款、外储注资、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重组上市的全套，更托赖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福，从“技术性破产”变成今天全世界最盈利的银行。为什么这一套并不复杂的操作还是能轻易突破层层内控？怎么就没变化呢？

说没变化也不对。那次内外串通，需要几乎银行分理处全体工作人员合作，这次中行内蒙分行案，目前的说法是有三位银行工作人员参加，一位做前台业务，两位做后台业务；那次只是“劫持”银行信用，这次“劫持”银行信用外，还发生了劫持人质事件，而作案者的主要诉求，竟然是三位银行人员复职！更不要说这次的涉案金额余额是40亿元，是那次的数十百倍。

中国银行业变与未变，在中、建、工行上市后到2009年之前，关心的人很多，它关系到中国银行业是告别过去还是只不过新一轮循环的开始。到今天关心这问题的人已经不多。“4万亿”已经给出了答案。

用法治驯服特权 郑戈

法律上的形式平等与人民生活状况的实质不平等之间的矛盾，即使在成熟的法治社会也难以避免。法律能够发挥的最大作用在于确保机会平等，使人们有可能通过教育、努力工作或正当的市场投机，来改善自己的状况。

另一方面，法律也可以确保经济不平等不会直接转化为政治和法律上的不平等，比如通过选举制度使穷人也能有自己的政治代言人，通过法律援助制度使司法程序显得大致公平，通过一视同仁的执法标准使得富人不敢为所欲为。

通过这些制度性安排，钱与权之间有了一道人为设置的鸿沟，富裕阶层或权力阶层不至于全方位占先，将穷人和弱势群体逼向绝路。

当然，法治也无法完全阻止特权阶层的形成。比如，最近香港终审法院大法官包致金的侄女袭警案，就引起公众关注。这位包小姐三次殴打警察，均只被判处了社区服务、缓刑、暂扣驾照和罚款等未剥夺自由的处罚。类似的袭警案，在香港一般均会处以监禁。

不过，此案判决虽然在香港招致了猛烈的舆论批评，却并未减损人们对司法系统的信任。因为法院在大多数案件中均能做出公正的判决，而且即使在包小姐案中也给出了详尽的判决理由（比如被告人的精神状态）、严格遵循了法定程序并依法做出了判决。

相较之下，中国内地最近发生的几起涉及特权阶层或疑似特权阶层的案件中，涉案者不仅没有因为其“特殊背景”而受到优待，反而因为种种缘由受到了更为严厉的惩罚，比如“军二代”李天一。其主要原因，恐怕是政法系统考虑了“人民群众的感觉”。当这种“感觉”通过互联网等不易控制的媒介爆发出来的时候，就使得这一类案件成了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从而有了“特殊案件特殊处理”的必要性。

单看案件处理结果，人们可能产生一种错觉：中国内地政法系统更加重视实现实质平等，通过严打特权阶层的违法行为来拉平人们生活境况之间的差距。但只要把眼光放宽一些，就可以发现，这种特案特办的方式不仅践踏了法治，而且也无助于实现实质平等。

实际上，这种治理手段仍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危机处理”模式，而不是把侧重点放在消除病因、防微杜渐上的“风险管理”模式。即使个别特权阶层人士在高调干坏事之后遭受了严惩，也并不能改变一个更具一般性的事实：特权阶层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享受并挥霍着特权。

高调违法引起公众围观的只是这一普遍现象中的一小部分。用违反法治原则的方式来处理这一类案件，是扬汤止沸的手法，并不能防止此类案件的不断发生，更无法触及大量的、低调的、处在公众视线之外的特权践踏法律现象。就“京城四少”之一王烁的故事而言，剧情发展到闹市持枪威胁他人这一高潮，事先是经过了許多铺垫的。仅就已曝光的事实看，他购买并持有多支枪械并曾纠集多人损坏他人车辆。在这些事情引起公众关注之前，他总是能够借助自己的“关系网”成功摆平这些事情。

这种自身经验以及观察自己圈子中其他人的类似经历而获得的认识，必定强化了他的特权意识，认为只要不是太出格，事情总可以摆平。特权者们所具有的分寸感和限度感，必定不同于普通人。当他们依自己的分寸感而行动的时候，其尺度之大往往令围观者震惊。这便是此类事件层出不穷的原因之一了。

要使法律有效，必须使它内化为人的行为规范。除了制度化的司法和执法措施，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彼此评价也很重要。中国社会目前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社会的严重分化以及“阶级矛盾”的再次凸显。这种环境中，享有平等权利的“公民”这个概念只停留在纸面上，公民之间的守法监督以及公民对政府的监督都无法实现。

孔子尝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在君主制和贵族制已经失去其意识形态基础、平等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社会，严重不平等的境况必定会导致人心不安，由此导致社会失序。

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有两种：要么追求实质平等，通过累进制所得税来“劫富济贫”，这便是北欧诸国和加拿大等国所践行的福利国家理念；要么确保机会平等和形式正义，完善教育，使普通人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在社会等级阶梯上攀升，比较典型的是美国。

但这两种模式都必须立基于法治，才能具有可持续性。否则，福利国家和机会平等，都会沦为特权阶层敛财和垄断资源的幌子。这里法治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而意味着以宪政为总体框架的法律之治。

当蓄奴在美国还是一种合宪实践的时候，林肯在1857年的Springfield（斯普林菲尔德，美国伊利诺斯州首府——编者注）演讲中指出：如果不遵从《独立宣言》的指引，《宪法》就会成为邪恶暴政的遮羞布，而且这种暴政不会仅仅是针对一个特定的种族。所谓《独立宣言》的指引，便是“人人生而平等”这一“宪法之上的法律”。

同样，中国宪法序言当中也确立了一项“高级法”，那便是人民主权：“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如果这项作为立国之本的宪政原则，能够通过具体的法律安排落到实处，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阶层便无处容身了。

作者为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助理教授

公投不可以行政

危机检验政治家的成色。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将与欧盟和国际银行业达成的减债与紧缩计划付诸全民公投，是政治领导人极度不负责任之举。内外哗然，幸而在压力下终告取消。帕潘德里欧以民主为辞，只是遁辞。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公投可以立国，不可以行政。

现代民主国家采取代议制，有一整套赋权与制衡机制。全民直接选举是一切政治权力的来源，但绝不能用于整个链条。公投可制宪以定国体，可决主权大事如加入欧盟，但不可用于行政。不仅仅是因为成本高昂，更因为民众诉求需要集纳、对冲和整合，政治才有起码的稳定。要防止精英弄权，也要限制民众迷狂，而皈依在宪法。领导人在其任期内行使宪法所赋权力，受托管理国家，为国家负责。这是权力，更是职责。

现在正是希腊政治家行使权力承担责任的时候。希腊已经财务实质破产。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外部债权人同意减债一半，并要求希腊增收减支提升还债能力，方案整体并不苛刻，比诸当年韩国要举国捐金还外债，可谓宽仁。

希腊民众不愿承受眼前痛苦，但对外违约不仅道义有亏，更有损国家长远利益。违约之后，国际资金敬避三舍，希腊痛苦调整一样无法避免，民众还是要调低生活水平。没有外部支持，痛苦不会减轻，只会更重。

帕潘德里欧应提交减债方案，由议会表决，哪怕此举可能导致其下台。这才是政治家作为。帕氏付诸公投，一家老小一人一票表决是否对外赖账，不会有任何悬念。帕氏大任当前，选择逃避，幸而未果。

利益相关者所能做的，是与这种政治破产分子保持距离。

不独立 死掉了

屁股决定脑袋。话糙理不糙。狗汪汪叫，猫喵喵叫；令狗猫叫，令猫狗叫，其情可悯，无事生非。莫如让狗狗叫，让猫猫叫；莫如让凡有屁股的都听其指挥，一股生气从屁股直冲顶门，张嘴大叫，天下庶几太平。

只有极少数人没有屁股，所以脑袋独立，既听狗叫，也听猫叫，说其所见，述其所思。新闻记者厕身其间。一个社会的观察、记录、传达和评论者，必须在这个社会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屁股丛林之外。不关人性，工作使然。

英国《世界新闻报》是小报，市民读者爱读什么就登什么。窃听电话录音案，展现商业利益从价值判断到操作层彻底控制媒体的后果：如果读者对耸动和猎奇需求强烈，那就满足他们；如果需要不择手段，那就不择手段。刺激-反应-更强的刺激-更强的反应，黄色新闻像毒品。

《世界新闻报》覆灭，不是因为独立，而是因为不独立，不能独立于商业利益。独立于商业利益、独立于权力、独立于多数人，是新闻记者执业的起点，也是高标（参见2011年第2期本栏目文章“真相”）。

人生天地间，生老病死之忧，亲亲友友之乐，记者何尝缺了一样？独立二字，行之实难。前途漫漫，以此相勉。

不难预测

以邻为壑的冲动很强大，日本恢复零利率，为坚挺的日元减压，也宣布各国减息和货币贬值新一轮竞争到来。IMF对美欧都发出了警告，但注定是被充耳不闻。尽管本刊向来认为，中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应尽快加息，加快人民币小步升值的节奏，但这一轮国际竞争性的减息和贬值动作，短期内封闭了中国政府选择这些政策的空间。在宏观退出上保持谨慎，对具体行业如房地产定向降温的做法，必然得以强化。熊熊炉火熟视无睹，只往热锅泼冷水，管不管用？管用多久？

新一轮房地产调控措施已于国庆长假前出台。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A股市场上房地产公司股价大涨。国内假日期间，香港市场上内地房地产公司股价继续大涨。相对于动利率，股市认为其他调控措施都是利好。它提示的方向是房价将继续上涨。

但房价已经很高。美国单体住宅的中位价格不到20万美元。以房价最贵的曼哈顿为例，在纽约时报二手房搜索引擎上搜索，次级地段，三四居到排屋，报价在80万美元到100万美元之间可选范围不小，很贵，但这也正是北京东北四环外中上社区三四居楼房的二手报价。

往长期看，也许2020年，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将使房价转向。在那之前，房价涨得越高，跌下来的痛苦越深。

至于房产税，政府决定从地产利益中多拿走一块，跟平抑房价有什么关系？哪儿的地先卖完了，哪儿就会先试点房产税。先易后难，政府行为不难预测。

你喜欢哪种创新？

华锐风电的故事多么性感！2006年成立，步步踏准新能源产业政策变化的节奏，2008年即超越所有对手成为中国风电设备制造业第一。现在又如期走上IPO通道。国企加民营股东的股份公司制、绿色、高科技、PE热捧、上市在望、快速收获。下一目标是全球第一。政策与市场合力创造冠军，这不正是最完美的中国创新故事？

也许。但我更喜欢的创新故事，发生在身边。

几个月前，丽华快餐公司在北京东北部推出了外卖服务到家美食汇，送的不是自己的快餐，而是数十家中档餐厅的菜肴。这些餐厅自办外卖有成本门槛，不上规模不见得划算。到家美食汇集中外包了这些餐厅的外卖。从几十个餐馆的菜单中点菜，然后送菜员摩托送到。一家餐馆一次6元。送菜员经过良好训练，有效率，精神饱满。

几天前，火锅连锁海底捞也在北京推出了自己的外卖服务。火锅外卖，闻所未闻，但海底捞做到了。五环内一个半小时送到，全套炊具，口味不打折，服务不打折，只需多付29元。海底捞为什么要送外卖？因为门店太火。等位一小时以上是常事。在不付出开店成本的情况下，海底捞靠外卖再创造出一个门店的销售额根本不是问题。

餐饮竞争最充分，催生如此美妙的创新：不用政策，不求政府，在拥挤的市场中发现需求，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满足它。挤不到上市额度，没关系，因为利润真实可持续。创新当中有黄金，只要你是丽华，是海底捞。

如何应对负面报道？

如何应对负面报道？

本来不该我来谈这个问题。我是新闻工作者，应该站在问题的对岸，坐看河岸这边的大火，但我忍不住了。小则红包封口；大则进京捉记者，跨省追捕，全国网上追逃。再没有恰当的指导，奈苍生何？

指导只有一句话：压制负面舆论没有用。全国有两千多家报纸、七八千家杂志、数百万个网站，得手眼通天到什么地步才压得住？就算这些渠道控制住了，还有BBS、各种即时通讯工具，现在又有了微博。微博功能会成为每一个有进取心的网站的标准配置。每个渠道也许只是根野草，很弱很好搞，但野火烧不尽，压不住。

压住了，又怎样？本期文章“问题茶油秘密”召回”讲述了一个故事：湖南金浩公司茶油产品被查出致癌物超标，但政府与企业选择秘密“召回”，召回效果存疑。

这结果难道对企业好？信息不透明，消费者会选择相信可靠不可靠的传说乃至阴谋论。如果不告知金浩公司哪个年度哪个批次的茶油致癌物超标，消费者会拒绝所有金浩公司的茶油。如果不告知哪家公司的茶油致癌物超标，消费者会拒绝所有茶油。更严重的是，如果披露不充分，消费者会拒绝相信以后的所有披露。披露还是不披露？充分披露还是限制披露？哪个损害更大？

压制负面舆论没有用。如果没错，大声地说出来，确保你的嗓门大过对方；如果有错，认错。惟一能止损的办法，是重建信任。

最好的自我保护

跟所有人一样，在《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报道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案被警方“全国通缉”事件中，我反对公安机关粗暴干预新闻工作者履行其新闻报道职责。以此事而言，事涉上市公司，公众有天然的知情权，新闻工作者有责任有权利作报道。如果上市公司对报道有异议，可以沟通；沟通不果，可以兴讼。以打击记者人身为目的的粗暴干预，不可接受，不能容忍。事情曝光后，当地警方纠正错误，向当事人道歉。这是新闻界近来少见的维权成功案例，是警方自律的结果，更是舆论和公义的胜利。

同为新闻工作者，我还想说，新闻工作者最好的履职手段，同时也是最好的自我保护工具，是准确和全面的报道。准确带来客观，全面带来平衡。这是新闻工作者职业生涯的起点，如果不持之以恒，则往往变成终点。

准确和全面的报道，出自新闻业的基本职业训练，更出自独立立场，出自不受权力、金钱和关系左右的新闻操守。无论何时何地，包括在今天的中国，知易行难。同行们想必跟我一样注意到，人们珍视新闻自由，却常常并不尊重新闻工作者。这并不悖谬。言论固当自由，但时有掌握言论枢纽者不孚此任，收红包则缄口，不进贡则以负面报道相挟，明知采访对象谎言如流却趋奉迎之只为这样更卖座，为求煽情视剪裁事实为无物。不一而足。

独立的新闻操守不是决定新闻报道空间大小的惟一因素，也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却是新闻工作者自己能决定的最重要因素。在警方向新闻媒体道歉之时，我愿以此自警，并与同行共勉。

最容易的事情

什么是抄袭？就是你把别人的创造装作是自己的。别人的创造，包括文字、讲话、音乐和其他非物质产物。至于被抄袭的对象是谁，抄袭的部分占抄袭者全文的比例多少，意图是否良善，多少人围观支持，根本不重要。

2004年，我有机会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SAIS）学习一年。第一节课，老师根本不讲别的，只讲抄袭（plagiarism）。我心情沉重。要不抄袭，原来这么难。

外国人用别人的话，是这么说的：“如某某所说，‘前引号’，然后引用原文，结束时要再说‘后引号’”，以示意引用结束。麻烦不麻烦？麻烦。不这样说行不行？恐怕不行。当时有某校长发言引用别人言论未作说明，最后被逼辞职。

但这还是容易的部分。更困难的部分是间接引语。在这堂课之前，我以为只要说明来源就没有被控抄袭之虞。我想得太简单了。

老师说，说明来源只是第一步。还要做这么几件事：第一，不能引用太长，这样太偷懒了；第二，必须改变原文的语言结构；第三，不能沿用原文中最关键的词汇。一句话，哪怕注明引用，你引用也得有创造性。

美国与中国在抄袭上的差距，要用光年来度量。无法要求国人都来做我做过的习题。但做到第一点并不难：不要把别人的创造装作是自己的。请读本期文章“汪晖抄袭风波”。

挑战经济传统——对话索罗斯

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又来中国。此次他带来一个新的研究机构 and 一套他总结的经济理论。索罗斯认为，金融危机证明，基于量化分析的主流经济学实际上已经破产，经济与金融研究亟需新的思维框架。在世界金融秩序前所未有的动荡之中，他看到中国金融市场落后，反而成为领先的资本；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处于新兴状态，反而少受英、美框架的陈规限制，可以独辟蹊径。这位70岁的匈牙利人一向不走寻常路，他投资的逻辑是越与市场主流方向相悖，越容易获利。

5月7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改革》执行总编辑胡舒立与几位经济学教授对话索罗斯，《中国改革》主编王烁主持此次对话。聆听索罗斯的观点，对于正在适应新的国际定位和探寻未来路径的中国，当有助益。

金融危机谁之过

索罗斯：我先谈两件事情，一是我关于金融市场的理论，第二是我新建立的这家机构——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 INET）。研究所的众多经济学家认为，危机中金融市场已然崩溃，目前盛行的理论实际上已经瓦解，政府必须采取强势的干预才能避免全面危机。目前盛行有效市场假说和理性预期理论实际上是错误的。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开始重新思考经济。

量化分析框架在美国学界行其道，持其他观点者则受到抑制，因为学术刊物都以同行评议为基础，他们的文章无法在期刊上发表，也就无法获得大学聘用。中国整个学界并未禁锢在垄断性的主流思想中，中国经济学家可以探寻新的方式来审视市场和经济。因此我将INET带来中国，邀请中国经济学家参与。

INET是个开放的机构，就像中国过去提倡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我的理论也有待新思维的检验。

在我的理论中，人类活动充满思考，参与人的决策对经济活动本身影响巨大，思想影响事件的进程。思想扮演双重角色：一方面，人类希望了解周围的世界；另一方面，人类希望影响世界。这两项功能指引我们朝着两个相反方向发展。假设发生了一件事，事件的参与者形成一个印象，试图去理解这件事情，这种理解是因变量。当人类希望影响某个事件时，形成自己一定的观点，这种观点是自变量。但是当两种情况同时发生时，实际上人们就丧失了认知函数中的自变量。因为一种变量会自动成为另一个变量的因变量。这就为事件过程带来众多不确定性。

这两种功能，我称其中一种称为认知性功能，另一种为操纵性功能。两种功能之间的互动就产生了反馈机制，也就是反身性（reflexivity）。在其他领域，例如机械工程领域也存在各种反馈机制。

反馈分两类：正反馈和负反馈。在负反馈情况下，人们对现实的认识更接近现实本身。在极端情况下，两者之间产生某种联系，经济学家称为“均衡”。但在正反馈情况下，两者实际上离均衡越来越远。

金融市场能产生以上这两种情况。认为市场是趋向均衡的观点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远离均衡的发展趋势和趋向均衡发展趋势同样可能。尤其是，当市场为金融资产错误估价，进而影响资产的基本面时，所谓的基本面其实也深受市场影响。因此市场并不是经济环境的被动反映，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之间存在互动。

当错误的估价影响市场的基本面，改变后的基本面数据似乎进一步验证了错误估价，加剧了价格扭曲，所以才有市场的熊市牛市不断更替，其原因不是外部的什么危机，而是市场自身与生俱来的特点。

因此，市场本身不一定稳定，只有靠实行一系列政策才能达到均衡。这种政策不一定出自政府，但其目标应当是维持市场稳定的。因此监管者和金融机构对市场如何演进影响重大。他们本身对市场理解远非完美，而政府的行动和市场的反应之间同样存在互动。比如，金融崩溃来自于市场的失败，也可以说来自监管的失败。

金融泡沫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信贷的充裕性和抵押物的价值，即抵押物是否真值这些贷款。奇怪的是，人们常常想当然地认为，抵押物的价值是独立的，和信贷的充裕性没有关联。这种错误常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在金融危机中，最显著的就是房地产泡沫。

监管者常常错误地理解市场本质。他们认为，有效的市场假说是监管的基础。这是一种错误。当错误成为教条时，金融市场的泡沫就在所难免。

每当出现泡沫，政府着手进行干预。为了让实体经济免受泡沫的影响，政府提供额外的信贷，帮助出现问题的金融机构，以拯救市场。人们以为市场会因此趋于均衡，其实反而催生了超级泡沫，这种泡沫在过去25年中不断发展。每次金融危机和政府的干预都加强了超级泡沫的形成。我们无法预测超级泡沫何时最终破灭，因为不知道政府何时能控制住形势。

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我当时认为超级泡沫将会破灭，但实际上政府向市场注入了大量流动资金，使得超级泡沫继续发展。之后的互联网泡沫，以及2001年美国遭受的恐怖袭击，政府维持低利率，又产生了房地产泡沫，直至最后2008年“次贷”引发的全球危机。

我的理论无法预测事件产生的原因，因为不确定性本身无法预测，参与者的行为在事件过程中共同决定其走向。事实上，金融市场的特点就是揣测尚属未知的各种走向。哪怕理论无法预测未来，我们必须承认，这就是现实，我们不应该期望经济理论能够对尚未确定的事情提供事先确定的预测。

主持人王烁（《中国改革》主编）：我来小结一下你的观点：第一，有效市场假说并不真实；第二，全球金融系统从基本上来说是不稳定的，在这次危机中已经支离破碎；第三、这次的危机与此前不同，因为在这次危机中，超级泡沫破灭了。

李稻葵（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我对这三点深有同感。第一：经济学需要改革，一些基本观点已被证伪。一些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原则需要重新审视。第二：需要改革经济学研究机构的机制，尤其应该改革英、美的大学机制。第三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核心。博弈理论中有相当多的研究认为，人们的观念是左右均衡的重要变量，由此产生了多重均衡。泡沫其实是一种平衡。泡沫破裂是另一种均

衡。当众人观点一致时，均衡就是自我实现的。所以博弈论中已经有观点与你的理论呼应，只是这太过技术化，没有被广泛接受。我建议，要推广你的经济理论，或许应当先融合这些现有理论。

实践中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以审计制度为例，一年前美国还用公允价值计价，这本来就蕴含了自我实现的反馈在其中。这对泡沫的产生有相当大的责任，因为这制造了投资、市场价格和人们预测之间反反复复的正反馈效应。另一个例子是评级系统，希腊的主权评级被下调，该国借款的利率立刻就提高了，反过来加剧其主权债务，这明显也是正反馈效应。所有的评级机构总是观点一致。这很有趣。他们是这个游戏的一部分，也是泡沫的一部分。

你的思考和建议，也许能帮助中国建立必要的机构，减弱这种正反馈效应的影响，减小未来金融危机的冲击。金融危机不可避免，但我们希望以后的金融危机不这么严重，而且仅仅发生在一地经济，而非传导至全世界。

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市场充满着各种不确定性，没有人能预计危机何时发生、规模究竟有多大。人们的预测有时听起来很有道理，实际发生的却不同。我觉得危机有两大特点：一是总会发生；二是总发生于你最没有想到的领域。但市场总有可预测之处，你总能看到一些问题聚集的领域。看看北京、上海的房价，就知道肯定有泡沫，但你不知道房市什么时候崩溃。政府必须清醒地认识市场的现状，有效地做出判断。不仅要看到数学模型，也要看人类行为，以及人类行为与市场的互动。

中国应当从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但要避免吸收错误的信号。许多专家批评美国金融衍生品的泛滥以及过度松懈的资本管制，认为美国不足为中国所效仿。但是这些并不能说明金融创新的理念以及开放金融市场的方针是根本错误的，也不能证明国家应该严格管制资本市场。中国的金融改革仍然需要沿着创新和开放的道路继续前进，不能因为美国金融危机而因噎废食。

徐建国（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总结经济学问题时，我们也应该思考如何最大化原来的成果，为经济学改革所用。经济学家总是试图通过市场的负面反馈来寻求市场均衡，但是所谓“均衡”一词很容易使人们陷入认识的误区。人们往往以为均衡代表了稳定状态，而事实上均衡状态下的许多因素是不确定的，是一种动态的均衡。

索罗斯：中国有机会从别国危机的错误中学习，而且可能引领更好的市场系统。美国经济学家坚持用量化的方式来预测和处理危机，最终导致了不可持续的极端情况，因为有些危机是无法量化的。哈耶克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发表获奖感言时，也强调不确定性，警告芝加哥学派的同事，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被量化。

中国的金融市场还在发展之中，国有体制让其在危机时期可以更好的控制。中国的监管机构能直接给银行下达指示，而西方监管者自上世纪60年代后就不能这么做了。所以中国因落后而领先。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得到错误结论，因为中国的系统也蕴含了自身的危险。我理解黄益平的观点，因为目前领先，中国很容易认为自己的系统是先进的，应该得到加强，而忽视了风险。

会计系统和公允价值计价确实有潜在的自我实现性。公允价值的替代品同样有问题。同样的交易，在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其处理很不一样。这些资产在投行就得按照公允计价。这次危机中，投资银行被个个击破，但并不意味着商业银行就很稳固。例如欧洲的银行就有杠杆率过高的问题。因此，如何处理杠杆，目前没有特别好的解决办法。

多大程度的杠杆作用是有益的？有效地增加杠杆作用能增强资本的效率，但是过量使用经济杠杆也会产生问题。均衡点在何处？我们也不知道。但杠杆率必须经常改变，给市场上的普遍情绪一个反向的引导作用。

我们要汲取的一个教训，就是必须控制经济中杠杆作用以及总体信贷数量，以此调节市场情绪，中国目前正在这么做。现在中国经常改变银行最低资本金的要求，对市场走向起到作用。这个是西方不怎么用的手段，中国经常使用。

潜在的危机在哪里

胡舒立（《中国改革》执行总编辑）：请问索罗斯对高盛事件的看法。

索罗斯：无论对高盛的起诉是否最终成功，这已经体现了高盛在职业道德上犯了大错。在高盛的公司利益和客户（投资人）的利益之间是有冲突的。如果我们已经建立起一套合理的控制金融参与者的规范和监管措施，就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事件。市场是不完美的，监管也是不完美的。如何加强监管，规范金融体系，这一过程相当困难。特别当下关于金融改革的讨论缺乏专业化，主要是被政治热情驱使。以前金融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立法，他们的游说使得立法变得缺乏威力。金融危机之后，投资银行活下来了，正享受他们逐步恢复的市场地位。现在是多家垄断的情况：四家（投资）银行控制着75%的市场，在缺乏竞争的体系下，他们大量使用金融衍生工具获取高额利润。民众的愤怒情绪对于促进立法是有帮助的，但我们应该知道，立法总是不完美的。

奥巴马政府不向银行注资，而让他们破产。因为在他们看来，注资在政治上不可接受。所有他们没有采取北欧模式，而是用日本模式，让银行赚钱自我救赎，即提供廉价的货币，允许银行获取高额利润。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将信用卡的（贷款）利率从已经偏高的8%提高到近乎离谱的30%。这使得很多依赖信用卡的民众受损，无法按时还贷，但银行获利丰厚。允许银行盈利的决策导致了民众在政治上更强烈的反对，推进立法的进度。一个例子就是去年波士顿茶党战胜了马萨诸塞州民主党的参议员候选人。

听众提问：有人说金融衍生工具有罪，但某种程度上它可以帮助金融业发展，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你怎么看？

索罗斯：市场原教旨主义强调，因为市场可以确保资源的有效分配，所以应该允许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这会自动保护公众利益——这是明显错误的，只存在于理想状态下。但另一方面，这种想法允许金融市场不断扩张，因为金融领域利润巨大，而且杠杆作用明显，回报比其他一般产业要高得多。

金融体系的变化发展过快过大，但它同时也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摧毁金融体系，也就摧毁了经济利益。人们现在分成对立的两派，一方面愤怒的民众希望摧毁金融系统；另一方面又有必要维持经济活动，两者冲击，带来很多困惑。人们需要更为冷静的头脑，正确的缩减规模。

我的观点是，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工具要遵守规定，评估风险，CDS是非常高风险的工具，不应该被普遍使用，只能让那些能够确保会合理运用它的人使用。有些过度缩减和反杠杆操作是毫无必要的，容易矫枉过正。

听众提问：你是如何运用你的理论来投资的？

索罗斯：我的理论并没有给我答案，但是提供了清晰的思考框架。

我们可以把投资看做某种游戏。下棋时你知道规则，而在金融市场，你不完全了解规则，因为你对规则的理解在改变，而你的阐释也可能改变规则本身。我一直尽力尝试改变游戏规则，而不是遵循某一特定规矩。

我的投资不是随机的，也不是基于什么内部消息。我知道自身认识有盲点，也未必比其他投资者更为及时改正自己的投资错误。但我一直在寻找我在投资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尽管不知，但我有假设，假设越远离市场的主流认识，你就越有机会获得更大的利益。

听众提问：我的问题是关于价值的，你对于开放社会的定义是什么，哪一个国家最符合你的定义？

索罗斯：我认为，美国代表了很好的开放社会的例子。虽然美国的开放社会不完美，但是有改善的希望，人们有创造财富和获得成功的机会，这个国家对多样性和不同观点敞开胸怀。有人认为，批判性思维的目的是帮助我们认识复杂问题。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操控性作用，这种操控性改变了我们的政治生活。美国政治不是为了理解事实，而是操纵事实，运用各种手段技巧获得选举。

当然美国有很深的危机，人们尚未认识到这一点。我经历过苏联的解体，看到广泛的危机不仅蕴含在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也来源于民众情绪。不夸张地说，类似的情况正在美国发生。包括选举、立法制度等运行了200多年，事实上已经改变了轨迹。人们想要革新，奥巴马总统给出变革的承诺，也得到广泛响应。但奥巴马落入了系统的圈套，被机制束缚，不能兑现变革的承诺。这对民众的士气和看法有很深影响，加重了美国的社会危机。

“中美关系不是‘G2’，也超越了在‘接触’（engagement）和‘遏制’（containment）二选一的阶段。许多人在寻找对中美关系的重新定义，你有没有一个新定义？”

周四下午，与同事黄山一起专访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Jon M. Huntsman）时，我这样问他。

最近一段，无论采访还是交流，我常问美国人这个问题。比如，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负责人李侃如就认为，未来两三年将决定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或者发现彼此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合作，或者转向双方在各个领域遏制对方影响力。这是一个比较灰暗的预言。

我不天真。我知道美国驻华大使不是最适合回答这个问题的人。美国对华政策制定的枢纽在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东亚事务主管部门，而决策是总统的特权。美国驻华大使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有其位置 and 影响力，但不适合有一个自己的对中美关系的定义。

但洪博培不是普通的美国驻华大使。50岁，在民主党政府中任职的共和党人，30岁出头就在老布什政府中任显职，两任犹他州州长，他被看好为潜在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当然，现在一切都只是可能。

这么一个人，在北京任职才十个月，已经经历了中美关系从冰冷到温暖的一个完整周期。我提中美关系定义问题，并不是想从他那里了解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看法的另一个侧面，就是想知道他个人的看法。

答案在本文文章“洪博培说”。

新思维

《新世纪》周刊截稿是周五，忙里偷闲，我上午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致福轩主持了索罗斯与中国学者的对话。索罗斯说，中国因为落后，所以这次危机后反而掉到前面（China is ahead because China is in the back）。这是对话的点睛之笔。

索罗斯此次来华，是推广他的INET（Institute of New Economic Thinking）理念。他准备未来十年捐赠5000万美元，以鼓励自由的经济学教育和思考。学院式经济学受正统规范束缚太深，不能应对已经变化了的现实。

现实发生了什么变化？索罗斯认为，金融自由化、全球化，与监管的本地化之间，有内在的冲突，全球金融体系根本上就不稳定。此次危机意义更不同寻常，是超级泡沫的终结，超过“二战”以来所有危机，有重塑国际金融秩序的能量。索罗斯在新书中说，美国代表的国际化资本主义模式（international capitalism）遭受重创，尽管仍旧在国际金融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但主导能力大为削弱。另一面，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正在兴起。这是重大的范式变迁。索罗斯认为，不受约束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危险的，有可能带来国家间的冲突。他认为，衰落中的大国与兴起中的大国有可能相互合作，合力创造新型的、更公平的国际新秩序，管理各自的衰落与兴起，因为不合作的结果是两败。但如何合作，需要新思维。这就是INET使命所系了。

幸福在哪里？

中国人不觉得幸福，因为身处焦虑之中。买房者焦虑房价太高，地产商焦虑负债太多，地方政府焦虑紧缩政策将导致卖地款支持不了财政开支，中央政府担心泡沫失控中国会像日本一样失去十年。你会担心幼儿园和奶粉。你会担心斑马线，还有地沟油。

几天前，Google的Zeitgeist大会，请来了Daniel Kahneman。他是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本行是行为心理学。什么使你更快乐？

他这样说：

—“在美国，年收入8万美元以上，收入的进一步增加几乎不会导致情绪（mood）进一步变好，也就是说曲线是平的；收入在这以下的话，收入减少显著导致情绪变坏，曲线很陡峭。也可以说，如果你在美国年收入8万美元以上，就可以说幸福是钱买不到的。但没钱的话，生活就很不幸福。”

—“腐败非常影响整个社会的情绪。因为腐败破坏了人们之间的信任，而信任影响情绪。”

—“最影响情绪的，是你每天与你所喜欢的人在一起的时间长度。越长你就越开心。可是很多人在自己时间分配上完全错误。”

最后一条对我启发很大。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它都适用。无论中国今天怎样，明天怎样，你总能选择是不是与你所喜欢的人——亲人、伴侣，也可以是同事、老板——在一起，在一起多长时间。快乐与否，主要选择权在自己，主要责任也在自己。很可惜，正如Kahneman所说，很多人在自己的时间分配上完全错误。

保尔森答案

在5日下午飞抵北京一小时后，当天，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在他下榻的东方君悦酒店，接受了我们的专访。

64岁的保尔森不需要太多介绍。他是2006年至2009年初的美国财政部长，此前则是高盛集团CEO。这是保尔森2008年12月以来第一次访华，对他来说间隔已经很长。他来华次数截至2006年就超过了70次，直接叫他Hank（Henry昵称）的中国人数不清有多少。

尽管有出席博鳌年会这个很好的理由，人们猜测他此番较年会召开提前四天来京还有其他使命。4月12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出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全球核安全峰会。美方想在此前就人民币汇率升值达成谅解的期待昭然。保尔森在北京数日间面见多位中国领导人。4月7日夜，保尔森在财长任上处理金融危机的重要搭档、现任美国财长盖特纳访北京。把这些联系起来，不需要太多想象力。

但保尔森引人关注，还是因为他，加上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代表了美国应付这场金融危机的艰苦努力。谈到保尔森，人们会想起他在白宫向众议院女议长、民主党人佩罗西单膝下跪的镜头。在一场无果的两党争论之后，在至关重要的银行不良资产救助法案（TARP）议会表决之前，那一跪浓缩了保尔森在危机中的全部努力——实用至上。他先后支持修改市价计值（mark to market）会计准则，支持禁止卖空，甚至亲手注资投资银行。以前对他不可想象的事情，他说做起来并不困难，因为没有选择，“不然后果太惨重”。

我们问保尔森，他从这场危机中学到了什么？我们不仅想知道，这位出身华尔街的财长，在危机中，如何平衡自由市场原则、实用主义选择和道德风险，以拯救美式资本主义；我们也想知道，危机暂息后，他有没有为受创深重的美式资本主义找到一套有新意的表述。我们的问题与愿望，都攸关中国从这场危机中所学到的经验与教训。

4月5日，在北京东方君悦酒店17层会议室，保尔森回答了我们的问题。他的答案不一定完全令人满意，但值得倾听。

危机

“如果雷曼兄弟没有倒闭，我们没法获得国会特批的权力，那么多金融机构在崩溃的边缘，下一个死掉只是时间问题”

《新世纪》：我们都读过了你的新书On The Brink，今天这本书的中文版也出版了。我们上次采访你是三年前，很显然那以后你大多数时候都在应付挑战。能讲讲你学到了什么吗？

保尔森：那是一个非常艰难和有挑战性的时期，因为要处理的问题前所未有。当经历这些后，回顾过去我很高兴参与其中，因为我的金融市场经验、性格以及管理经验都使我能够帮助改善局面。

但是，我很高兴不再经历这一切。我知道当时在峭壁边缘，如果再有一个金融机构垮台，金融系统将会崩溃。

《新世纪》：早知如此，你还会不会来当这个财长？

保尔森：好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在最艰难的时候，布什总统几次对我说：“汉克，你应该欢迎这一切。”他的意思是，还好危机来临而你我彼此信任。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危机发生在总统上任之初一切都要重新学习的时候，就大事不妙了。

《新世纪》：你说自己信奉市场，但在这场危机中，你也曾不得不做一些自己以前不愿做的事，比如赞同禁止做空，比如救援金融机构。

保尔森：我从来不相信无监管、不受约束的市场。我总是相信市场需要好的监管。比如，2001年安然丑闻后，我呼吁通过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以遏制公司欺诈行为。

我确实非常难以接受救助濒于倒闭的金融机构，我相信那些冒风险者必须为损失承担责任。尽管如此，这个决定不难做出，因为没有选择，什么都比一场经济灾难好得多。

《新世纪》：如果有机会重来，你会让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吗？

保尔森：嗯，舒立，别忘了伯南克、盖特纳和我都多次说过，我们当时无权救助雷曼兄弟。有人不相信。他们相信美国一定有权力这么干，尽管他们不知道这种权力是什么。

在2008年10月我们从国会获得过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授权之前，美国监管体制非常过时，权力有限，尤其缺乏紧急授权，在破产程序之外，来清算一个非银行类的金融机构，如雷曼兄弟。美联储和财政部也无权直接注入资金或者担保其债务。

雷曼兄弟跟贝尔斯登和AIG不同。就像我在书中所说，2008年3月，当濒于倒闭时，贝尔斯登既有流动性危机，又有资不抵债问题。但当时有一个强有力的买家摩根大通银行，它既有能力解决资本金问题，又能为贝尔斯登的交易提供担保。2008年9月，AIG也面临流动性危机，但他们旗下有保险公司，其信用评级独立于母公司的信用评级，美联储可以为其提供贷款。

我们努力为雷曼兄弟找买家，但是找不到。为了让你的读者理解，简单来说，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我们没有足够的权力解决问题。我在这本书里细述了所犯的不少错误、希望可以避免的错误。但是，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监管系统，也没有足够的授权来处理这些问题。

你得真正了解这场危机。雷曼兄弟是病症，不是病因。在那个周末，我们在设法挽救雷曼兄弟，同时AIG和美林也在坍塌。这些都是长期积蓄危机的爆发。我们想避免雷曼兄弟的倒闭，做出了非常艰苦的努力，最后却失去了惟一的购买者英国银行巴克莱，因为英国监管当局否决了这桩交易。

假设美国银行买下的是雷曼兄弟，那么美林就不会有买家了，而Wachovia和华盛顿互助银行也在苦苦挣扎之中。事后看来，如果雷曼兄弟被救了，危机不在那一天发生；如果我们没去国会要求TARP授权，此后很可能是更大的灾难。这是大选年，国会快要休会，议员快要回家。所以有人这么说——他们可能是对的——如果雷曼兄弟没有倒闭，我们没法获得国会特批的权力，当时有那么多金融机构在崩溃的边缘，下一个金融机构死掉只是时间问题。

背景述评 金融危机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进程，而危机处理也同样。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之前，保尔森在新著里说，“我们只能凑合着往前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雷曼兄弟破产是这场危机的顶点，也是转折。它既震撼了全球金融体系，也使所有利害相关者认识到，必须要有一套完整的能够重振市场信心的方案，一机构一策的方案再也行不通了。

不熟悉美国政治运作规则的人很难理解：为什么不救雷曼兄弟呢？因为用纳税人的钱去援救一家投资银行，不在财政部和美联储的授权范围内。2008年3月，政府支持摩根大通收购即将崩溃的贝尔斯登，为其担保部分潜在损失，已经引发轩然大波。在英国金融监管当局否决巴克莱银行于最后一刻收购雷曼兄弟之后，保尔森没有可能在没有私营机构参与的情况下单方救援雷曼兄弟。这在美国的政治游戏中不可接受。

不可接受的事情，仅仅在一个月后就变成可以接受。在布什全力支持下，保尔森和伯南克在国会休会前的最后一刻获得了7000亿美元的TARP救援方案授权。尽管这一方案此后仍多变化，从收购不良资产转为直接向金融机构注资，但市场逐步趋于平静。

这一切之所以可能，是因为雷曼兄弟破产了。

教训

“就像人们死前要有遗嘱一样。金融机构应该就他们如何被清算立遗嘱”

《新世纪》：监管机构需要获得什么授权？

保尔森：我在雷曼兄弟倒闭前两个月就建议过——在2008年6月和7月，但奥巴马政府今天还在与国会合作希望获得这些授权。美国政府需要从国会获得危机处理授权，以便在需要时能干预濒临倒闭的金融机构，不论其是否是银行，而且可以在法庭破产程序之外清算这些机构，以避免危及金融体系和整个经济。

《新世纪》：此次危机整体上可以看做“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的考验。国际特别是美国金融体系应该怎么面对这个问题？

保尔森：我的答案是：这些非常大和复杂的金融机构构成潜在危险，需要做几件事。首先是更严格的流动性和资本金监管要求，但最重要的办法是我刚才说的，政府有权力在法庭破产程序之外来清算任何公司，不管其大小或类型。纳税人不必像现在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救助他们。

这很复杂，监管者必须非常有经验。监管者必须事先同这些大金融机构制定一个路线图，就像人们死前要有遗嘱一样。金融机构应该就他们如何被清算立遗嘱。监管不可能完美，总有公司会倒闭，必须要有办法清算他们，避免“大而不倒”的情况再度出现。

《新世纪》：金融危机很快从一国扩散到全球，这需要国际金融体系做什么调整？

保尔森：不会有全球监管，但需要全球协调。有一整套的事情要做，首先是更严格的资本金和流动性要求。标准化的信用违约互换产品（CDS）应在交易所交易，以增加透明度。非标准的CDS必须向其清算机构说明，并要缴纳更多的抵押。因此我们需要改革评级机构，改革资产证券化的过程。

必须强调，不仅是在美国，而且是在世界范围内，监管机构需要权力在破产程序之外清算濒于倒闭的机构。

另外，很多问题是政府政策造成的。美国很久以来一直提倡拥有房屋。拥有房屋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刺激走得太远了，以至于造成房价泡沫。我们需要重新考虑美国刺激房地产市场的政策。美国是全球不平衡的一极。美国人储蓄太少，消费太多。其他国家则需要消费更多。

长期以来造成的不平衡需要很长时间来改变。但在美国，我们过去没有足够的工具，没有一个有效的监管机制。金融市场总是走在监管系统前面，金融市场的创新导致复杂和不透明。规则和法律需要赶上市场的发展。

这就是为什么在担任财政部长时，甚至在雷曼兄弟的问题出现前，我们建议成立一个全面的监管制度。现在多个监管机构同时插手，各自关注局部问题，而不是全局。

背景述评 雷曼兄弟破产冲击全球，因为它以数百亿美元的资本金，30余倍的杠杆率，形成了近万亿美元的交易部位，而在进入破产程序后，全数冻结。全球金融市场所有主要玩家几乎都受影响，由此激发连锁反应，所有人都担心其交易对手会是下一个雷曼兄弟，于是不再与任何人做交易。全球金融体系的齿轮里突然塞进一根铁杠，系统接近停摆。

什么叫“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过去这个词属于银行，因为只有银行才有足够大的资产规模。现在这个词属于所有将杠杆用足的金融机构，不管它是不是银行。它可以是一家投资银行如雷曼兄弟，也可以是一家对冲基金，十年前的对冲基金长期资本，就是先例。

保尔森的建议，是再大的机构也可以倒，只要政府有权处置危机金融机构，将其置于法庭破产程序之外清算。所谓置于法庭破产程序之外，指政府被授权可以以各种手段担保被清算机构的交易部位有序平仓，不至于整个金融体系停摆。这至少需要两大改革：第一，金融机构破产不一定非得走普通企业法庭破产程序；第二，政府获授权可用纳税人的钱，来保证其主持下的特别清算过程平稳有序，但这些钱是可能发生损失的。没有国会立法，这都办不到。

通胀

“通胀不是美国未来几年内需要面对的大问题。真正严重的挑战是长期财政赤字”

《新世纪》：你认为美国经济前景如何？

保尔森：我相信美国经济正在复苏。失业率仍很高，但金融市场和金融系统目前稳定，经济在恢复增长，房地产市场多半已经触底，只是需要时间恢复。我认为美国的表现远远超越欧洲。

华尔街改变很大，但欧洲金融机构改革的步伐更加缓慢，因为需要资本金和流动性监管条件要提高。美国国会还没有通过改革法案，但是现在谈论的很多观点都是正确的，我相信其中很多最终会成为法律。我并没有掌握什么消息，但是我相信关于信贷违约掉期、衍生品、评级机构的法案会通过。美国的金融监管会更加严格，会对资本金和流动性有更高的要求，最终监管权力覆盖范围会扩大到如我们所愿。欧洲对此有抵制，他们银行的资本金还不及美国同行多。

《新世纪》：美国经济在复苏中，那么危机以来采取的各种援助和刺激政策如何退出？

保尔森：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所启动的那些救援项目，退出正在迅速进行。比如说向银行注入资本金的计划，银行正在募集资本还政府钱。美联储和财政部联手的TARF计划也是。有一些干预政策的退出尚未开始，比如对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援助退出仍为时过早，联储还没有开始卖出其所持有的房地美和房利美的证券。我不想评论联储何时改变政策。美国很幸运有伯南克在处理这些问题。他从一开始就置身其中，他又懂市场又懂经济，他会找到解决之法。

《新世纪》：通胀形势会不会变得严峻？

保尔森：在未来几年间，美国经济遭遇通胀的几率很小。为了稳定金融系统而投入市场的资金，全部或者绝大部分，会在五年内收回。短期财政赤字显得高得惊人，因为我们正处于严重衰退中，也因为其中一部分并非政府开支，而是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股本投资，这部分迟早会回来的。通胀不是未来几年内需要面对的大问题。

真正严重的挑战是长期财政赤字。这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美国目前的社会福利政策——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公共医疗补助制度等。我在美国也说，这是代际之间的问题。每个父母都愿意牺牲自己为孩子争取更好的生活，所以我不怀疑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但等得越久，回旋余地就越小，也就会为下一代留下更多负担。

《新世纪》：许多中国人担心美国印钞，将自己的问题全球化来解决问题。

保尔森：美国政府和美联储采取了必要措施，避免整个系统崩溃，让经济回到正轨。退出策略的确重要，伯南克是担当此任的不二人选，所以我并不十分担心退出。我更担心的是社会福利支出过高导致过高财政赤字，但这不是近期要务。我们还有时间处理这个问题。

《新世纪》：美国保持准零利率这么长时间，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措施？

保尔森：与中国一样，美国采取了刺激计划和应对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中国需要美国能继续顺利走出危机，美国的复苏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极为重要。对于美国来说，长期挑战是储蓄太少，消费太多。如果美国民众能少消费一点，多储蓄一点，那将是件非常好的事情，但目前我们这个国家仍然还没实践这一点。

背景评述 认为美国会通过印钞让全球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这种观点在中国观察者中相当普遍。保尔森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把答案分作三截：短期，美国没有通胀问题；中期，此次放出去的货币将在五年内回收所以没造成额外的通胀压力；长期财赤问题很大，但这跟眼下有什么关系？

这些回答很有道理，但能化解中国观察者的担忧吗？

中国经济

“尽管有副作用，中国政府应对危机的做法是正确的”

《新世纪》：大规模政府投入，加巨量银行贷款，中国经济目前的复苏健康吗？

保尔森：从2008年12月后我还是第一次来中国。但是我看到，美国和其他国家都为中国所采取的行动感到庆幸。在此次全球衰退中，中国成为了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

包括刺激政策和巨额银行贷款在内的行动，不可能没有副作用。没有事情是完美的。有一些负面影响，比如沿海城市的房地产泡沫，还有银行贷款过剩，政策性贷款和商业性贷款区分不明，但我认为中国政府做了正确的事情，而我们都因此获益。

《新世纪》：有观察者认为中国可能重蹈日本20年前的覆辙。你有这个担心吗？

保尔森：中国和日本的情况很不相同。日本的错误为中国提供了可借鉴之处。中国正在制定自己的改革路径，正在经历向市场型经济转型，并且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我认为最大的风险是不继续前进或者过于缓慢的推进这场使中国受益非凡的改革。

《新世纪》：普遍的看法是此次危机后，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变成更强大了。你同意吗？

保尔森：中国经济在危机之中表现非常好。决策者行动迅速，采取了正确的措施。

我倾向于从中长期的角度看问题。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各国的人，都应当从这场危机中吸取恰当的教训。我们的教训不是金融改革和市场失效了。事实上，正是金融改革和市场化让千百万中国人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脱离贫困。

对于美国来说，教训是经济模式需要改变。我很高兴看到中国经济在危机中表现如此强劲，在未来的数年中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亮点。但是，相信我，没有哪国的经济发展会一帆风顺。

背景评述 保尔森特别能理解中国政府在2008年底采取的以“4万亿”为标志的一揽子经济振兴措施。他在解决自己的危机的时候，已经完成了自我教育。禁止做空？他支持。救援金融机构，非做不可，因为不这样做的后果还要坏得多。副作用有，但可控。

但与许多人不同，保尔森没有混同事急从权与长期机制。他强调中国不要从这场危机中汲取错误的教训，不要放弃也不要放慢朝向市场机制的转型。他提醒，不管一国经济增长多么强劲时间多么长，总有一天会有波折。

中美

“在做决定（开G20峰会）前，我们咨询的第一个国家领导人就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新世纪》：你在书中多次提到，与中国经济决策者们在危机期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给你什么好建议了吗？来自中方的合作对于你处理危机有多重要？

保尔森：我担任美国财长之后，就启动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这增进了理解和互信。我与中国同行经常对话。中美两国有相似的利益。世界金融系统稳定对于美国非常重要，对中国也是如此。中国在此一直具有相当的建设性。

我认识中国副总理王岐山很长时间，这当然很有助益。中美在各个层面相互交流。比如说，当需要召开全球领袖峰会的时候，布什总统要决定是叫G7还是G20。他的决定是G20，这也是我的推荐。在做决定前，我们咨询的第一个国家领导人就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他表示赞同。我们因此知道中国愿意扮演重要的领袖角色，也知道开G20而不是G7是正确的。

《新世纪》：你说，没有危机什么也过不了国会山。你的中国同行没有这个问题，“4万亿”说上就上。你会不会羡慕他们？

保尔森：首先，我十分感激，两次得到国会支持，采取行动阻止金融系统的崩溃。许多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第一次是给予财政部处理“两房”（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无上限的授权。第二是通过TARP授权7000亿美元救援方案。美国的民主共和体制有很多优点，是一个伟大的体制，当然也有时让人感到折磨，特别是要做出艰难的复杂的改革，在危机出现之前，国会很难通过。

《新世纪》：中美之间未来经济合作的主要领域是什么？

保尔森：中美两国在有些领域有共同利益，有的则有竞争。应该很坦诚的面对这些不同领域，寻找解决之道。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全球发展、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对双方都有利；孤立和保护主义对双方都有伤害。我们都是主要的石油进口国、能源消耗大国。因此发展和应用清洁能源技术，以取代石油，是两国共同的利益所在。气候和环境也是如此。在许多议题上不存在国家界限。

背景评述 在2006年担任美国财长之前，保尔森70余次造访中国。他与中国经济决策者们关系熟稔，与他们中的不少人保持着友谊。他在书中提到最多的其他国家是中国，中国副总理王岐山、央行行长周小川也都多次出现。在他犹豫不决时，后者还曾亲自劝说他要出任这一职务。

正因如此，当保尔森担任财长后即启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机制时，人人都认为，他找到了将长期积累的中国资本用来推进中美沟通与互信的最佳机会。

数年之后回顾，与创设时人们的期待相比，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留下了遗憾，成果乏善可陈，突破几乎没有。在经历了2001年加入WTO五年过渡期后，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动力有所失速，在三年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表现昭然。

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失色之时，G20峰会成为国际政治顶级舞台上最耀眼的新机制。正如中国一位中央银行家告诉我们的那样，以前只有G7首脑会议、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没有过G20首脑峰会。G20首脑峰会，由美国总统布什发起，以寻求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全球解决之道。从保尔森的回答中，我们得知：它起于保尔森的建议，决定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支持。

人民币

“我不做猜测，我已经不是财政部长了”

《新世纪》：你任财长时，从未将中国定性为汇率操纵者。你的逻辑是什么？奥巴马政府会不会更有可能将中国定性为汇率操纵者？

保尔森：不论是公开的还是私下场合，我都说人民币汇率采取灵活机制是非常重要的，符合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利益的。能够灵活反应经济状况的人民币汇率可以促进和谐的经济增长，更有效地控制通胀，控制房地产泡沫，也可以使社会更广泛地享受到经济繁荣的益处。

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所以我们希望中国决策者认识到这对中国自己有益。这也是中国是否继续改革进程的一个标志。我们不为中国贴上货币操纵者的标签，我们只是敦促继续改革。

《新世纪》：中国这次会不会被定性为汇率操纵者？

保尔森：我不做猜测，我已经不是财政部长了。

背景评述 人民币再次启动汇改，公认只是个时间问题。纷纭说法，区别只是在是本月，本季度，还是下半年。两大事件值得关注：第一，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参加4月12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核安全峰会。第二，现任美国财长盖特纳宣布推迟向国会提交对其主要贸易伙伴汇率的评估报告。中国是否操纵人民币汇率，是人们对这份报告最关心的内容。公开原因是希望此举给中国政策调整更大的空间。这两者表明，4月12日之前所剩无几的时间，有可能构成中国再启汇改的第一个时间窗口。

不过，推迟发布报告之举，也有隐含的威胁之意，它使人更倾向于猜测报告的结果是负面的。美国财政部每半年向国会提交该报告，被认定操纵其汇率的国家，可能受到贸易制裁。中国从未被认定为汇率操纵者。

4月7日晚间，刚刚结束访问印度的美国财长盖特纳，“出乎意料”地出现在北京，并在4月8日同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会谈。除了会同王岐山商谈汇率问题，即将在5月下旬在北京举行的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也应是两人会谈的话题。王岐山和盖特纳分别领导两国对话的经济部分。

金融开放

“Hank，我们的老师有麻烦了”

《新世纪》：三年前采访你时是在财政部，你说中国应进一步对外开放金融业。你说中国应在既得利益长得太大无法控制之前开放。但很明显，此次危机之后，中国决策者不太愿意往前走。你还准备如何说服他们吗？

保尔森：开放金融市场，也是在中国法规之下的。中国将以管理本国金融机构同样的方式来管理合资或外资机构。他们都是在中国市场运行的。市场化的汇率机制对中国和其他国家都有利。长期来看，一个如此巨大的经济体，其产品，服务和贸易都深度融合到世界经济之中，没有开放的金融市场和市场化汇率机制是很难的。

我的逻辑是，更有效率的资本分配有助于创造新的产业、就业和增长。更多的金融产品和投资机会也有利于中国人分流储蓄，创造财富。更多的产品和投资机会、储蓄机制和利率并不能使他们放进银行的钱带给他们足够的收益。因此，我主张中国逐步放开金融市场。

中国在金融市场改革以及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私有化方面所作出的成就，是非常显著的。无论什么时候说这些，中国的决策者在长期改革方向上都没有变化，区别无非是节奏。

当然，也正像你所说的，危机发生的时候，中国副总理王岐山跟我说，“Hank，我们的‘老师’有麻烦了。”

《新世纪》：中国没老师了。

保尔森：（笑）对我这样在市场中度过一生的人来说，这话让人清醒。（王岐山）总是很坦诚。

背景评价 许多致力于改革的人士认为，此次金融危机，中国在经济上受创有限，但改革开放之路受挫，影响更为深远。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内部以经济自由化为主，外部以对外开放融入国际体系为主。在金融危机之后，两者都有所失速。国家干预主义不仅大占上风，还隐有固化可能。对外开放特别是金融对外开放的声音在金融动荡之下失声。中国30年来固然走所谓自己的道路，但自己的道路是不变量，变量基本来自“以美为师”。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的老师有麻烦了”，有麻烦的还有学生。危机之前和危机之后采访保尔森，保尔森敦促中国保持改革开放进程的理据和逻辑始终如一。这是好事，因为一以贯之；这又不是好事，因为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指导，老调重弹不够，要有新鲜内容。它在哪里？

评价

“很难因为避免了没有出现的灾难而获得表扬。所以我说，让历史来裁判吧”

《新世纪》：你担任过高盛CEO，你经历了一场金融危机，你还写了一本畅销书，接下来你会干什么？

保尔森：我打算把大部分时间放在自然保护、环境和能源方面。多年来我一直对此很感兴趣，现在能重新投入。比如在中国，我建立了一个环保方面的对话，参与云南自然保护项目，设立了自然保护委员会的亚太区理事会。我很关心环境和能源效率问题。我计划在这方面投入更多精力，也期待能对中国有所贡献。

《新世纪》：你会把投资银行经验用于你说的这些事情上去吗？你还有可能回投资银行业吗？

保尔森：我想用我的能力，我对市场的理解，做一些能帮助别人的事情，做一些应对环境挑战的事情。如果这些事跟金融市场有关，那是自然。但我不会回到这个行业。另外说一句，我觉得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十分重要。

《新世纪》：你跟高盛还有关系吗？

保尔森：我在高盛工作了32年，回忆很美好。但是去华盛顿任财长时，我已经终结所有联系，卖掉所有股票。现在和高盛没有丝毫关系了。我希望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好，但并不和其中任何一家有关联。

《新世纪》：从1到10，1最低，10最高，你给自己打多少分？

保尔森：历史留给历史学家来写。无论是投资银行家还是财政部长，我都尽到全力。在财政部，我权力不够，手段不足，又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我们做出的主要决策都是正确的。

系统性崩溃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在书里也写到，当雷曼兄弟倒下、AIG摇摇欲坠的那段时间，连最好的蓝筹公司都不能短期融资。继续下去，无论大小公司，不能融资，无法购买库存，不能支付供应商，不能发员工薪水。失业率完全可能一下飙升到25%，回到大萧条时代，上百万人找不到工作。我们避免了这场灾难的发生。

你知道在美国，“救市”是非常让人反感的词。调查显示93%的美国人反对救市。所以我们向民众说明，这些行动不是为了救华尔街，是为了救普通美国人。我和伯南克去国会作证，要求国会给我们权力时，整个金融系统已经冻结，经济在几个月之后会急速下行。国会是给了我们权力，但我们很难因为避免了没有出现的灾难而获得表扬。所以我说，让历史来裁判吧。

背景评价“你很难因为做出困难的决定避免了一场灾难而受奖，因为受益者没看到灾难的后果”，这句话的镜像更适合中国：不能因为做出容易做的决定，避免了一场危机，就觉得政府干预模式不可战胜。保尔森说得好，让历史来裁判吧！

财新《新世纪》记者韩薇、孙慧霞，实习记者龚橙对此文亦有贡献